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GWHHSZS

中日文化交流 史话

王晓秋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主编 任继愈●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中日文化交流 史话

王曉秋

060360



定价 0006613

山东教育出版社

鲁新登字 2 号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任继愈 主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于晓秋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187×1092 毫米 36 开本 $3\frac{5}{6}$ 印张 6 插页 56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700

ISBN 7—5328—1191—3 / G · 1005

定价 2.25 元

沁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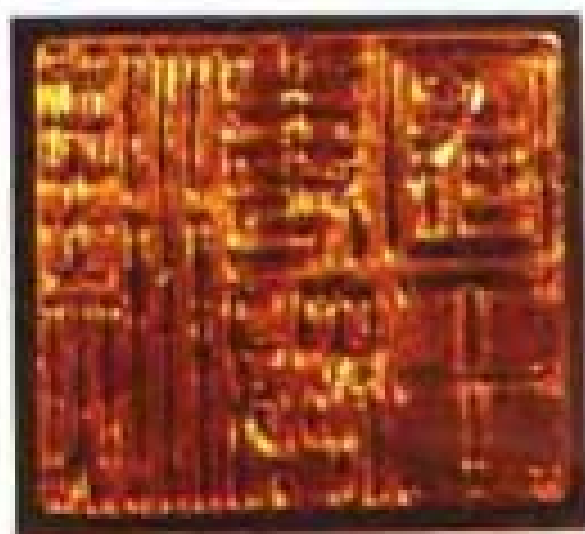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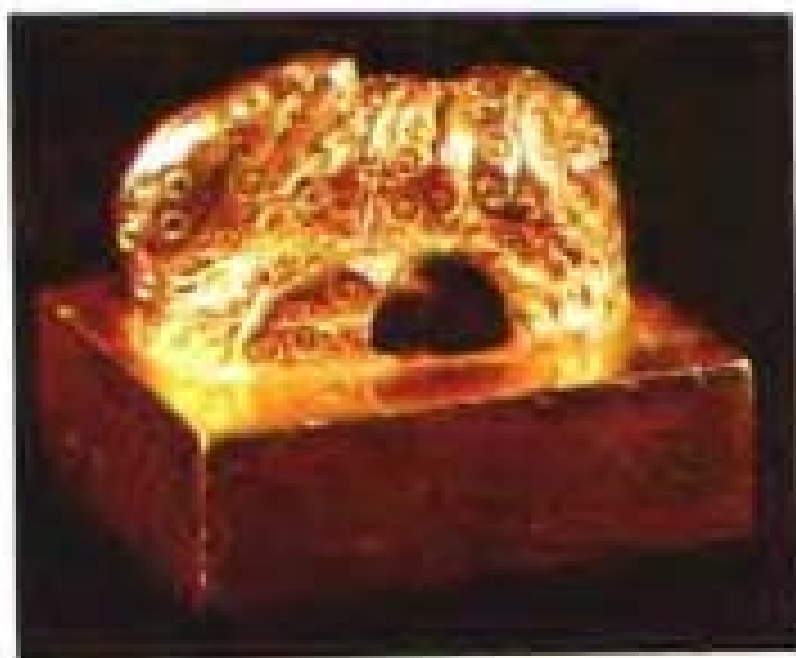
祝中日恢復邦交

赤縣扶桑，一衣帶水，一轡可航。昔但真盲目，
浮誇東海，亂衡負策，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
同膏肓，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兩千年友
誼，不尋尋常。豈容戰犯猖狂，八十載風
雷激大洋。喜雲霧霽而昇，渠成冰泮，秋
高氣爽。菊蕊花香，公報名傳，邦交恢復。一
片歡聲起四方，以今後，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

一九七二年秋作于北京 郭沫若



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墓



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王的金印和印文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鑑真和尚乾漆像



弘法大師空海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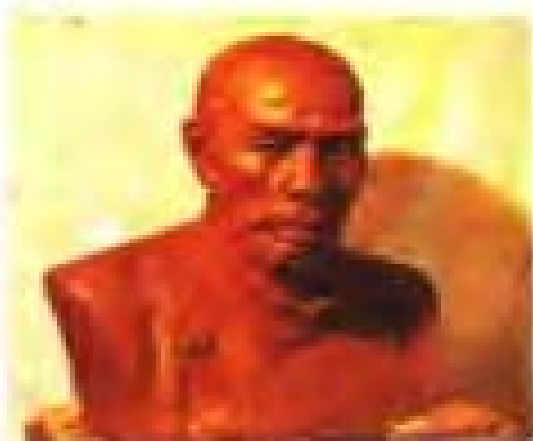
清朝人羅森

著者：小形赤子
松平重政



小形赤子

1854年日本画师小形赤子画的罗森像



黃遵憲塑像

日本裸子詩最初稿家
（度應社同稿）

黃遵憲手書“日本雜
事詩最初稿家”碑文拓片



黃遵憲的主要著作《日本國志》、《入境塵詩草》、《日本雜事詩》。



謹呈周君

惜別 藤野
野

藤野严九郎赠送鲁迅的照片
和背后的题字

编者献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长期

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而给爱国

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 110 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 年 2 月 22 日 北京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主编：冯钟芸 游铭钧 焦树安 *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金宜久
李思敬	卢海燕 *	骆桂明 *
马樟根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雪芳 *	沈心天 *
谭其骧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恩扬	吴 可 *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华纲
张明华 *	张习孔 *	赵 靖
赵匡华	钟碧惠	周 强
朱光暄		

〔名后有 * 者为执行编委〕

●责任编辑 / 朱晓晨

●装帧设计 / 吕祥琪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过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与生活习俗等12个方面,分110个专题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ISBN 7-5328-1191-3 / G · 1

定价 2.25 元。

目 录

概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 和分期·····	(1)
一 徐福的传说·····	(9)
——上古中国移民的贡献	
二 金印之谜·····	(16)
——汉代交往的实证	
三 遣唐使·····	(21)
——学习中国文化的盛举	
四 阿倍仲麻吕·····	(30)
——埋骨盛唐的日本留学生	
五 鉴真和尚·····	(38)
——东渡传经的唐代高僧	
六 弘法大师·····	(46)
——留唐学问僧空海	
七 裔然献书·····	(54)
——名留青史的人宋僧	
八 朱舜水·····	(63)

——流寓日本的明朝遗民

- 九 魏源与象山、松阴 …………… (70)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日进步思想家

- 十 罗森及其《日本日记》…………… (79)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 十一 黄遵宪与源辉声 …………… (87)

——清代中日文人的交往和笔谈

- 十二 留日热潮 …………… (96)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 十三 鲁迅与藤野先生…………… (105)

——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 十四 宫崎滔天…………… (113)

——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 十五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121)

——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书目

目 录

-
- 十四 隐元禅师——日本黄檗
禅宗的始祖 117
-
- 十五 魏源与象山、松阴——鴉
片战争时期的中日进步思
想家 127
-
- 十六 《海外新话》——描写鴉
片战争的江户小说 137
-
- 十七 罗森及其《日本日记》
——近代中日文化交
流的先驱者 145
-
- 十八 千岁丸上海之行——日
本开国后第一艘访华船
..... 155
-
- 十九 黄遵宪与源辉声——
近代中日文人的交往
和笔谈 163

中国文化史
知识丛书

目 录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二十 王韬的扶桑之游——中 日学者的交流和友谊	173
-------------------------------------	-----

二十一 冈千仞与《观光纪游》 ——近代日本人的访 华旅行记	181
---	-----

二十二 傅云龙——勤奋著述 的游历使	189
-----------------------------	-----

二十三 吴汝纶——赴日考察 的教育家	197
-----------------------------	-----

二十四 留日热潮——20 世纪 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205
--------------------------------------	-----

二十五 鲁迅与藤野先生—— 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215
-------------------------------------	-----

中国文化史
知识丛书

目 录



二十六 宫崎滔天——支持中 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225
------------------------------------	-----

二十七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 交流	235
---	-----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概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和分期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东亚邻邦，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1972年，为祝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中国著名学者和诗人郭沫若作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
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
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
不等寻常。”

（《人民中国》日文版 1973 年 1 月号）
赤县、扶桑是中国、日本的别名。鉴真、晁衡（即阿倍仲麻吕）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这短短的几十个字，生

动地概括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且不说远古时代大陆原始居民向日本列岛的迁移，仅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史，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而且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即使在两国国家关系恶化甚至发生战争的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和事例。

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

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成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时代，每个时代再划分为若干时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时代或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十九世纪初的漫长岁月。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二）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

是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改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的交流。

（三）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即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东海航行。交流方式较多表现为民间贸易、僧侣往来等形式。交流内容既有物质方面的商品贸易，也有精神方面的佛教、儒学、文学、书画等的交流。

（四）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如书籍、儒学、美术、书法、医学的交流。

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而日本文化经历了

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中国文化，逐渐创造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中日交流的内容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逐步扩展深入。交流面也从少数使臣官吏逐渐扩大到民间留学生、僧侣、以至商人庶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百余年，也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一) 1840 年（鸦片战争）——1871 年（中日建交），中国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朝，日本是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这个时期是东亚受到西方冲击，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转折时期。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间贸易，只有少数中日商人能往来，内容有书籍、文学、艺术等。尤其是反映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刊，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1871—1894（甲午战争），中国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日本明治时代。两国通过建交缔约，互设使领馆，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国官员、学者、文人来往络绎不绝，文学诗歌交流盛况空前。

(三) 1894—1919（五四运动），中国

清末民初时期，日本明治、大正年间。这个时期有大批中国留日学生东渡，还有许多中国官员学者赴日考察新政，日本也有不少教师学者来华。交流内容十分广泛，教育与思想交流尤为突出，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四）1919—1945（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是民国时代，日本则是大正末年和昭和时代。这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十五年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即使在两国关系恶化以至战争年代里，中日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日本进步人士的反战运动仍然始终不断。

总的来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规模和内容都比古代有所发展，更富于广泛性群众性。由于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却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趋向更多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45年至今的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 1945—1972 (中日恢复邦交)，中国 1949 年以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日本仍是昭和时代。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告终，结束了日中两国之间长期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两国人民为改变两国之间不正常状态和坚持民间文化交流，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 1972 年至今，日本是昭和时代，平成时代。经过长期艰苦努力，1972 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恢复邦交，开始互派人员，缔结协定，推动文化交流。1978 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从此中日两国可以在完全平等友好互利的立场上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现出空前规模的新高潮。

以上只是简单地勾画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历史轮廓。可是要在这本几万字的小书里全面系统地叙述如此漫长丰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不可能的。我想还是用史话的形式，从中选择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生动的

典型事例，来向读者描述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最辉煌最动人的篇章吧。

一 徐福的传说

——上古中国移民的贡献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因此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说明原始先民们已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与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中日两国广泛流传的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正是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史实。

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背山面海的一

片樟树丛中，有一座石碑，刻着“秦徐福之墓”几个大字，常有人来参拜，献上一束鲜花。当地群众每年九月还要举行盛大的“徐福祭”，纪念这位传说是两千多年前来到日本的中国友好使者。徐福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东渡？是否真的到了日本？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饶有趣味并值得探究的问题。

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到徐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史记》原文为徐市，市音 fú 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史记·秦始皇本记》）。司马迁还描写徐福首次出海回来，对秦始皇声称曾到蓬莱见到海神，请求“延年益寿药”，海神嫌秦皇礼太薄而不给。秦始皇又遣其携童男童女三千、百工及武器、谷种等出海。不料徐福此次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以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也有关于徐福率

童男女出海求仙的记载，有的则说他到了夷洲、澶洲。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的诗中也提到过徐福出海。不过这些史籍和诗词中都没有确定徐福到的就是日本。

中国最早明确肯定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撰《六帖》一书。他不但说徐福到了日本，而且说那里有座富士山，“亦名蓬莱”（《义楚六帖》卷21），这样便和司马迁所言“三神山”联系上了。此后宋、元、明、清各代文人墨客的许多诗词文章中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两人赋诗唱和竟也以徐福东渡为题材。朱元璋写道：“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御制赐和》）清代首任驻日参赞官黄遵宪抵日本后也作诗咏徐福：“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日本杂事诗》）在中国民间，尤其山东荣城、诸城、即墨各县和江苏连云港、赣榆一带，都流传着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人考证江苏北部赣榆县的徐阜村或山东黄县的徐乡就是秦代徐福的故乡。山东即墨沿海有个徐福岛，当地传说是徐福东渡时船只避风上水之处。

徐福的传说也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民间更是把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附会。不少地方都有所谓徐福的遗迹和故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船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据说徐福曾在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佐贺县每五十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在1980年。当地还流传徐福登金立山望西方怀念家乡和徐福与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故事。

日本传说徐福从九州又继续东行到本州，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纪伊半岛，因此近畿地区也有不少徐福的遗迹、传说。如三重县熊野市的矢贺海岸（熊野浦）被认为是徐福的登陆地，附近有徐福之丘与徐福墓，徐福宫。和歌山县新宫市的徐福町原有徐福祠，现有徐福墓碑，附近还有其亲信七人的墓以北斗七星的形式分布在徐福墓周围。新宫的居民每年九月一日夜在徐福墓前举行盛大的“徐福祭”。新宫市的一座小山被称为“蓬莱山”，相传徐福曾来此山采取长生不老药草。在富士山地区流传着更为离奇的故事，传说徐福一行最后在日本的“蓬莱”即富士山

麓找到了长生不老药，然而此时秦始皇已死，他们就定居在那里，向当地居民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徐福死后变成了一只仙鹤，经常依恋地盘旋在富士山原野的上空。在富士山麓也建有几个徐福祠。

传说虽然不等于历史，但它却往往事出有因，反映当时的历史与社会，并加以理想化，寄托人民的怀念和愿望。徐福东渡是否真正到了日本，现在尚难确定，然而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为什么能在中日两国长期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除了《史记》记载徐福出海的可靠性和当时条件下东渡日本的可能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在相当秦代徐福东渡前后的公元前二、三世纪，确实有大批中国移民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渡海来到日本。在日本历史上称他们为“渡来民”。这些移民大多是由于逃避周灭商殷、春秋战国战乱以及秦灭六国等战争的骚乱和国内的暴政而远走异国他乡的。徐福等人借入海求仙为名，带上人员物资，实行海外移民，以逃避秦始皇的虐政，在当时是很有可能。他们沿朝鲜半岛航行到日本九州，或再经濑户内

海航行到本州的纪伊半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赴日本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具有生产技能的劳动人民以及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带去了中国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特别是种植粮食和使用金属工具的技术。致使公元三世纪左右日本列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发生了突变。由以采集、狩猎、捕捞的生产方式为主的绳纹时代，进化到以种植水稻等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弥生时代。日本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变化。从九州和本州西部的绳纹末期遗址发现了炭化米和米谷的压痕，许多学者认为水稻种植技术和谷种是从中国大陆长江流域传去的。在九州和本州西部的弥生初期遗址里，不仅有中国大陆传去的陶器、铁器、青铜器（如铜剑、铜矛等），还发现具有中国华北人特征的人骨。这与徐福东渡带去童男童女、水手工匠以及谷种、工具、武器的记载和传说是一致的。日本民间传说徐福一行在九州或纪州定居后，就向当地居民传授农耕、纺织、冶炼、捕鲸、医学等技术。九州佐贺县的金立神社把徐福尊为农耕、养蚕、医药之神。本州山梨县的浅见神社则把徐福

尊为机神（纺织之神）。再从日本考古遗址的发现来看，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中国移民的势力已从离大陆较近的九州向东，经过濑户内海而逐渐向本州的近畿地区发展，到弥生时代中期，日本列岛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已从北九州移到近畿了。这也与日本流传徐福先到九州后又转移到近畿的传说相吻合。

总之，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正是集中反映了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移民促进古代日本文化和生产力飞跃发展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日本人民为了感谢和怀念中国移民的贡献，根据《史记》上徐福东渡的记载，把徐福作为古代中国赴日移民的代表人物来加以纪念和神化，编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因此，不论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新宫等地的徐福墓是真是假，徐福已经成为通过上古中日文化交流，向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了。

二 金印之谜

——汉代交往的实证

中国史籍上对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中谈到朝鲜海中有倭人（古代中国人称日本为倭），分为百余国，经常向汉朝进贡。当然汉朝也回赐许多礼物。从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璧玉等贵重物品证实了这一点。《后汉书》专门为日本立了《倭传》，进一步讲到自汉武帝征服朝鲜，日本派使者通汉的有三十余国。并介绍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后汉书》还具体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则赐予其印。那末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件事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这颗金印的故事。

公元 1784 年阴历 2 月 23 日，在日本九

州北部志贺岛叶崎地方，风景秀丽的小渔村里（当时属九州筑前国那珂郡，今属福岡县），一个叫甚兵卫的农民，清晨起来下地修筑水渠。在挖地时偶然发现一个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间藏着一个金属块。他感到十分惊讶，将金属块拿回家，请教于当地米店的主人，才知道这是一颗黄金刻成的印。金印被上交郡守并转呈黑田藩主，经过当时黑田藩的著名学者龟井南溟的鉴定，上面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原来就是一千七百多年前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印。于是它成了藩主家的传家宝，现在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珍藏在福岡市立美术馆里。在志贺岛发现金印的地点，还树立了一块刻着“汉委奴国主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周围加以绿化建设，开辟为游览休息的“金印公园”。

这颗金印果真是汉代皇帝所赐吗？金印出土二百年来曾经不断有人提出怀疑。据考证印文上的第一个“汉”字，表示受印者臣属于汉帝国，下面的“委奴国”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倭奴国，古时委、倭两字通用。该印经过日本计量研究所测量，印面为 2.34

厘米见方，约合东汉度量衡制铜尺的一寸见方，正好符合汉代赐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印上的钮是蛇形，下有横通小孔，供挂绶之用。这也与以钮的形状不同，如列侯龟、将军虎、蛮夷蛇等表示名分的汉制相符。1956年在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有一方刻着“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尤其是1981年，在中国的扬州市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了一颗“广陵王玺”的龟钮金印，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不仅印面尺寸相近，边长都为汉制一寸，而且篆刻字体也十分相似，印钮上也都有鱼子纹。这两颗印授与的时间只相差一年。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历史学者经过反复比较考证，进一步证实志贺岛出土的的确是汉光武帝所赐金印，终于解开了争论近二百年的金印真伪之谜。日本报纸《中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发现时说：“在日本历史上一一直独放光彩的志贺岛金印，传入日本一千九百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人们的脑海里也隐约地浮现出后汉的工匠为远道而来的日本使节、为王侯而施展才能的形象。”

金印是公元前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和文

化交流的标志和实证。当时中国先进的文明经过朝鲜半岛首先传到日本列岛最西端的北九州地区，那里最早使用铁器进行农耕。生产力提高以后便出现了以地缘结合为主的部族集团和奴隶制国家。其中较强的奴隶主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和满足发展生产以及军事和生活上的需要，便逐渐通过汉代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如乐浪郡），向汉帝国称臣纳贡，以得到中国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赏赐。北九州出土的汉代铜镜、铜矛、铜剑、勾玉等珍贵文物，就是当时汉王朝的赏赐品。倭奴国王是二千年前在日本列岛生产力最发达的北九州地区的奴隶主，甚至得到了汉光武帝赐予的金印。在金印出土处附近曾经发现细型铜剑的铸型，说明该地当时已能冶炼制做青铜器了。可是到公元二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生产力中心逐渐从九州东移到本州近畿地区，出现了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那样已有相当规模的古代奴隶制国家。《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日本二十一个小国都在女王卑弥呼统治之下。而九州的倭奴国可能在兼并战争中失败，其统治者只得把象征权力

和汉帝国支持的金印秘密埋藏起来。

东汉灭亡以后，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在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 239 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并借助中国声威对付与倭奴国的冲突，派遣使节难升米等前往魏国首都洛阳，进贡奴隶十人与麻布二匹，魏明帝不仅授以“亲魏倭王”金印，而且赏赐大量丰厚礼物，如黄金八两、铜镜百枚，文锦三匹，白绢五十匹，珍珠、铅丹各五十斤等，以至日本使节满载而归。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国王又多次遣使献贡，中国有时也派使节赴日，成为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虽然魏明帝赐予邪马台女王的“亲魏倭王”金印迄今尚未发现，其印拓文也难辨真伪。但是 1951 年日本大阪府泉北郡信太村出土的汉代神兽镜，在镜面缘上有铭文“景初三年陈国作铭之保子宜孙”，证明这枚铜镜就是公元 239 年魏明帝赏赐邪马台国女王的百枚铜镜之一，同样也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证。

三 遣唐使

——学习中国文化的盛举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四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倭王（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遣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 589 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

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 600 年、607 年、608 年、614 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公元 618 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今西安）。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623 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向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630 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 630 年至 895 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

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真正名符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

这十几次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公元 630—公元 669 年，共任命七次。使团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成员一、二百。航线走沿朝鲜半岛沿岸的北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制度。

中期：公元 702—公元 752 年，是极盛时期，共任命成行四次。使团规模扩大，每次达五百多人，分乘四舶，收获成果也最大。航线大多是经南方诸岛的南岛路。为了全面深入学习盛唐文明，实现全盘唐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

后期：公元 759—公元 874 年，是渐衰期，共任命九次实际成行仅六次。此期唐朝经安史之乱逐渐衰败，因此日本学习唐朝的热情有所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留学僧留唐时间也减少成一、二年。航线主要是直接横渡东海的大洋路。

遣唐使团的规模初期约一、二百人，仅一、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八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收输入中国的文明，同时也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唐玄宗在召见第十一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时说：“久闻日本有贤君，今见使者风度，果然不愧是礼仪之国。”并命画工描绘日本使臣的容貌，以作留念。

遣唐使团赴中国的航路可分三条。初期走北路，即从九州博多湾出发经对马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沿海，到山东半岛

登州或莱州登陆，再由陆路去长安。这条路历史悠久，比较安全，但航程长，需数十天。后来由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与日本关系恶化，被迫开拓新的入唐之路。中期主要走第二条南岛路，即从九州经过南部诸岛，如种子岛、屋久岛、奄美岛等。沿途停泊，然后横渡东海，到中国明州（今宁波）等地。这条路线风险大，航期也不短。后期又开辟了大洋路，即从博多启航，在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候顺风，然后横渡东海，直达扬州、明州等港。这条路航程最短，顺风十天内即可到达，但风险最大，经常出事。

遣唐使团在赴唐和回国途中要与狂风恶浪搏斗，经历千难万险。在成行的十六次往返途中，遇风暴袭击或触礁遇难而毁掉的船共有十艘。如公元734年第十次遣唐使团返日时，四艘船出海不久即遇风暴，第一艘漂至种子岛，第二艘被吹回中国，第三艘漂到中印半岛的昆仑国，乘员大多遇难或病死。第四艘失踪，始终下落不明。不少遣唐使团成员以及唐朝派出的聘日使节，途中遇难以身殉职。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架起了这座海上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

日本政府对遣唐使团极为重视。遣唐使出发前一个月，大使等使臣就要入朝拜谒天皇。天皇当面授予节刀，赐酒赏物，并告谕使臣要遵守唐法，尊重唐俗，约束部属。使臣还要到神社祈祐平安。出发前夕，朝廷给使臣赐宴，有时特备中国酒席饯别。天皇还即席赋御诗，以示优宠。如孝谦女帝饯别遣唐使藤原清河时，祝福他们：“水行如地土，乘船如坐床，平安渡海洋。”同时给使团成员、随员、留学生以至船员水手大量赏赐。由于留学生需在唐朝长期留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接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

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政府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读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

人还借用汉字的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此外，还吸收中国各种技术工艺等物质文明，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丰富日本人民的生活。遣唐使团通过朝贡贸易交换礼品等方式进行日唐之间的物资交流。输入唐代先进的农具如唐锄、唐犁，以及种茶、织染、雕版印刷等技术。还有陶瓷、漆器等工艺。如奈良三彩即仿造唐三彩。建筑方面，八世纪日本的首都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都是模仿唐都长安城建造的，许多寺庙也都是仿唐建筑物。

遣唐使于公元 895 年废止，其原因除了唐朝政局动乱以外，还有日本经过二百多年吸收移植盛唐文化，已基础上完成了仿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学习中国文化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

造成经济困难，加上路程艰险，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九世纪中叶以后，唐朝商人赴日贸易不断增多，正可弥补过去仅靠遣唐使解决的对唐货的需求。因此公元 894 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十九次遣唐大使菅原道真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四 阿倍仲麻吕

——埋骨盛唐的日本留学生

随着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日中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阿倍仲麻吕（公元 698—公元 770），中国名字又称朝衡、晁衡，字巨卿或仲满。他出生在日本大和国十字郡一位官员阿倍船守之家，自幼聪明好学，才华横溢。716 年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717 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同年十月到达唐都长安，时年十九岁。当时中国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社会安定，文化繁荣。长安人口号称百万，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达数千人之多，在国子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也经常有数百名，并受到唐廷优遇。阿倍仲麻吕与同来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日本留学生，通过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鸿臚

寺的安排，也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学习期间一切费用都由中国政府提供。经过近十年的苦读钻研，阿倍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公元7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并出仕唐朝，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掌校经史子集。这个职务使他能博览群书，还有机会接触唐朝君臣。由于阿倍仲麻吕德才兼备，诗文俱佳，唐玄宗李隆基对他十分器重，先后提升他任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等官职，经常在御前侍奉。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为官四十多年，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最后埋骨唐上，被中日史籍引为美谈。

阿倍仲麻吕在堪称诗国的唐朝，与许多著名诗人名流交游，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本来就有很高的诗赋修养，又经常与唐人诗友唱和切磋，受到熏陶，诗艺更加精益求精。中日诗人之间留下了许多唱和赠答佳作。唐代诗人储光羲是其好友之一，曾在洛阳赋诗赞颂阿倍的人品才学。诗中写道：

万国朝天中（指中国），东隅道最长（指日本）。

吾生美无度（指晁衡），高驾仕春

坊（指其职）。

诗人魏万也是他的知交，当魏万要回王屋山时，两人依依惜别，晁衡以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裘服相赠。因此著名诗人李白在诗中描绘魏万：“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风尘。”（《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

公元734年，第十次遣唐使团在大使多治比广成的率领下完成任务准备归国时，照例要把随上次遣唐使留唐已经结业的留学生带回本国。与阿倍仲麻吕同来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都于此时回国。已经在中国度过十七年生活的阿倍仲麻吕也十分怀念祖国和亲人，希望早日回国报效。但因他已在唐朝做官，便向唐玄宗提出东归省亲的请求。消息传出，他的中国诗友们依依不舍，纷纷赠诗告别。如秘书少监、诗人赵骅写了《送晁补阙归日本国诗》欢送他“东隅返故林”。同时也深深理解他思念故乡日本，又舍不得生活多年的中国的矛盾心理，这是只有知心朋友才能体察的内心活动。这首诗已成为赵骅传世的唯一作品。可是由于唐玄宗赏识晁衡的才华，竭力挽留，没有批准他回国。阿倍仲麻吕只得挥笔写了一首诗

回赠他的朋友：

“慕义空名在，偷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古今和歌集》）抒发了他游子思故乡，想忠孝难双全，归国遥无期的感慨。

公元752年，以藤原清河为大使，吉备真备为副使的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唐玄宗命阿倍仲麻吕负责接待来客。吉备真备是他当年一起留唐的同学，久别重逢，当然格外亲切。阿倍以中国官员身分热情周到地款待他们，并奉玄宗之命引藤原等日本使臣参观珍藏九经三史的三教殿。753年，遣唐使团准备回国时，已经留学中国三十六年的阿倍仲麻吕再度奏请与使团一起归国。这次唐玄宗不忍再留，决定擢升他为秘书监兼卫尉卿，以中国护送使的身份，陪送遣唐使一行回日本。中国友人们闻讯，同来欢送。在告别宴会上，诗人们纷纷赋诗留念。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与阿倍仲麻吕交情甚厚，听说他要回国，不禁心潮起伏，写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这一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诗的长序洋洋洒洒六百余字，首先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赞扬日本“服圣人之

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无“尔虞我诈”之事。然后叙述阿倍仲麻吕少年留学唐朝，“名成太学，官至客卿。”并希望他回国后能“传道经子绝域之人。”王维虽然自己没去过日本，但在与阿倍仲麻吕等日本友人相交中了解到不少日本及海上情况，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像力，描绘了遣唐使团船只渡海的壮丽图画。他在诗中写道：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当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讯若为通。”

表达了与阿倍依依不舍的真挚感情。

诗人包佶也挥笔写了一首《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的诗。把阿倍仲麻吕作为日本天皇的使者、唐玄宗的臣子来描写：“九泽蕃居使，千年圣主臣。”赞美他的知礼、朴实、诚恳的美德。“野情偏得礼，本性本含仁。”接着写他衣锦还乡的场面，“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最后希望他以后再来中国访问，一片深情溢于言表。

此时五十五岁的阿倍仲麻吕离开故国已

有三十六载，即将踏上归途，回到父母之邦，拜见久别的慈亲，使他激动、喜悦。可是留唐岁月也使他铭感难忘，一旦要离别众多的中国友人，又觉怅然若失。这种矛盾心理，充分表露在他的《衔命将辞国》一诗中，他写道：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诗中一方面写如何怀念祖国和久别的亲人，另一方面则写对第二故乡中国和朝夕相处的友人的依恋之情，感情真挚动人。

到了遣唐使返航船停泊的港口苏州黄泗浦，不少中国友人前来送别。当时正值十一月十五日之夜，皓月当空，阿倍仲麻吕即将登舟之际，遥望明月，乡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用日语吟诵了一首和歌：

“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

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这就是日本古代和歌中有名的《三笠山之歌》或称《望乡诗》。当时中国友人听不懂日语，他又译为汉语吟咏，众人闻之，感叹不已。不料遣唐使船队入海以后，遭到风暴袭击。藤原大使和阿倍等乘坐的第一艘船被

狂风刮走而失踪。后来其余三条船相继回到日本，第一船却仍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第一艘船上的乘客可能已经全部遇难。

消息传到中国，友人们以为阿倍仲麻吕已遭溺死，无不悲痛万分。当时正在苏州漫游的唐朝大诗人李白，闻讯非常难过，含泪写了一首《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诉说日本的晁衡离开了长安，一片出征的帆影穿过蓬莱岛。接着李白把阿倍比喻成一轮皎洁的明月，沉没于碧波大海之中，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忧愁和悲哀。

其实，李白只是一场虚惊，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第一艘船被漂流到南中国海的安南地方，部分船员于驩州（今越南河静省，当时属唐南海郡）上岸，却又遭到土著袭击。第一艘船上日本乘客死难一百七十多人，仅有阿倍与藤原等十余人幸存。这些幸存者于755年6月历尽艰难长途跋涉回到长安。第二年中国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阿倍仲麻吕随玄宗入

蜀，年余后返京，以后被肃宗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又奉命赴安南处理事宜，旋任镇南都护。唐代宗时，766年，已经年近古稀的晁衡又被提升为安南节度使，任满后回京，爵封北海郡开国公。770年在长安与世长辞，埋骨中国，享年73岁。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唐代宗追赠他为潞州大都督。

阿倍仲麻吕虽在唐朝擢升高官崇爵，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曾多次写信，托朝鲜新罗使节带回本国，以寄乡思。因此日本古籍《古今集钞》中说：“仲麻吕在唐凡五十余年，身虽荣贵，思归不已，言及乡国，未尝不悽惻也。”当时唐朝对日本的交涉事务，常由晁衡参与或主持，为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作了许多贡献。836年仁明天皇追赠其正二位，诏书中高度评价阿倍仲麻吕：“身涉鲸波，业成麟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已播。”（《大日本史》阿倍仲麻吕传）

五 鉴真和尚

——东渡传经的唐代高僧

文化交流总是有来有往的。在唐代，既有日本遣唐使和阿倍仲麻吕等留学生、学问僧的西来，又有中国聘日使和鉴真等高僧的东渡。阿倍仲麻吕和鉴真和尚一个为学习中国文化，一个为传播中国文化，都历尽曲折，最后埋骨异国，两人的动人事迹交相辉映，永远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鉴真（公元 688—公元 76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出家到扬州大云寺为僧。由于他勤学苦练，并得到名僧的指点与教诲，年轻时已成为佛门高徒，并赴洛阳、长安等地深造。鉴真从二十六岁开始在扬州大明寺讲授戒律（佛教约束教徒的条规）。据记载，他作为南方的授戒大师，曾先后举办戒律讲座一百三十余次，听过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僧人竟达四万余人。他还组

织僧人精心抄写经书三万三千多卷，参与设计建造寺院八十余所，并经常扶病济贫，广施救助。鉴真和尚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在中国以至日本都享有盛名。

当时日本虽也崇尚佛教，但佛教界律戒不兴，纲纪不正。因此日本元兴寺主持隆尊便向朝廷奏请聘唐朝高僧传授戒律。日本朝廷也正希望通过建立授戒制度，严格控制僧藉，便下令遣唐使团实行此事。733年随第十次遣唐使团来华的荣睿和普照两位日本学问僧，就负有此项使命。他们先聘到洛阳福光寺僧人道璿和印度僧人菩提赴日，可是他们只能讲经不能授戒，所以必须再邀请一位中国高僧前去传戒弘法。742年，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聘誉满江南的鉴真和尚及其弟子东渡。两位日本和尚说：“佛法传到日本之后，虽初具规模，但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过去有位圣德太子说过二百年后佛教将大兴于日本，现在正是实行这句话的时候了，希望大和尚能够东渡弘法。”（《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答道：“过去听说南岳惠恩禅师去世以后就托生为日本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还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

法，曾制千套袈裟分施我国僧人，并在袈裟上绣着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看来，日本的确是一个佛法有缘的国家啊！”于是鉴真问众弟子谁愿去日本传法？弟子们害怕渡海风险，一时竟鸦雀无声，无人答应。鉴真和尚虽已年过半百，却已下定东渡日本的决心，便毅然大声说道：“为了弘法传道，何惜身命！即使你们都不去，我也照样东渡。”师父这种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终于感动了弟子们，祥彦、道航等二十一人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赴日。然后他们就秘密造船并准备粮食、佛经、药品等物品。743年，鉴真一行正在准备出发之际，东渡计划却由于僧人如海向官府诬告而告夭折。

公元743年年底，他们再次购买舟船粮物，从扬州启航。不料出航不久，即遇狂风，船只触礁而破，第二次东渡又遭失败。但鉴真并未气馁，一个月后就在当地修好破船重新出发。744年春，驶到舟山附近，船又遇风暴被撞碎，只得弃船登岸，饥渴三日，才得救济，第三次航行又受挫折。当地僧侣不愿鉴真再冒风浪之险，甚至请求地方

官逮捕日本和尚荣睿。但是，这也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决心，在荣睿被释放后，他又派弟子去福州购船备粮。745年，鉴真一行在前往福州途中，又被地方官强制送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以受阻告终。

鉴真尽管四次东渡失败，受尽挫折，但仍矢志不渝。公元748年，他们又一次从扬州上船启航，先沿运河南下，到杭州湾出海。不幸，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就遇到了东北风，把他们吹向西南，经过十四天惊涛骇浪的漂行，舟中淡水用尽，艰苦备尝，结果不仅没到达日本反而漂泊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今崖县）。振州地方官派兵把鉴真迎入城内大云寺，住了一年。以后，经万安州（今万宁）、崖州（今琼山），过琼州海峡；又在桂州（今桂林）、南海郡（今广州）逗留。途中日本学问僧荣睿因长年辛苦跋涉，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高要）。鉴真悲痛万分，由于历尽艰难又在南方长期感受暑热，以至忧劳成疾，眼睛发炎，终致双目失明。在江西，始终追随他的忠实弟子祥彦也因病去世，对于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又是个沉重打击。鉴真一行经九

江、南京回到扬州，结束了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曲折行程。

鉴真遭到五次失败，也没有动摇东渡的坚强意志。公元 753 年 10 月，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准备回国的阿倍仲麻吕一同来到扬州拜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我们早就知道大和尚曾经五次东渡去日本传教，实在钦佩之至，今天能见到大和尚容颜，真是荣幸。如果大和尚还有此愿，弟子等一行四艘船舶，食物行装具备，东渡非常方便。”这时鉴真虽已六十六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却毫不退缩，欣然同意搭乘遣唐使船东渡。四天后他们即从扬州搭船赴苏州，与遣唐使其余人员会合。这次随行的弟子和工匠等人共二十三人。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象八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七种、华严经等佛经八十四部三百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临行前因怕被官厅发觉而一度下船，直到启航前才上了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753 年 11 月 6 日，这四艘遣唐使船正式扬帆出海。结果阿倍仲麻吕与藤原大使

乘坐的一号船被风刮走，而鉴真所乘的二号船在五天后漂到冲绳岛，又过了近一个月，于12月20日终于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经过十二年艰辛折磨、九死一生的鉴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公元754年2月4日，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城，被迎进东大寺，受到日本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皇族、权贵、僧侣都来拜见。3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分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不久天皇又授以其传灯大师位，并委托他立坛授戒。4月初在东大寺大佛殿设立了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于以及四百余位僧人授戒。以后又在东大寺专门建立了戒坛院。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两年以后，鉴真七十一岁时卸任，被尊称为“大和上”，“恭敬供养。”759年，鉴真及其弟子们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此后即在该寺传律授戒，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763年鉴真在唐招提

寺园寂（佛教对僧尼死亡的美称），享年七十六岁。777年第十五次遣唐使带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人服丧三日，并在龙兴寺设大斋会追悼。

鉴真亲自设计的奈良唐招提寺已被日本列为国宝，它是移植到日本的中国盛唐时期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精华。唐招提寺内的金堂被认为是现存的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鉴真对日本医学和药物学也有巨大贡献。他在国内已精通医药学，到日本后曾为天皇和皇太后治病，还靠嗅觉、味觉帮助鉴别中草药，以至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直到十七世纪江户时代日本药行的草药袋上仍印有鉴真的像。鉴真带去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和书法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唐招提寺内的鉴真和尚干漆像是鉴真去世前由他的弟子模影塑造的，该像双目紧闭而似含深情，前额宽阔，面颊含笑，两唇紧敛，显示了鉴真和尚不畏艰难的坚强意志和严肃和蔼的性格，是世界雕塑艺术的杰作，也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每年仅在鉴真忌辰时开放三天供人瞻仰。1980年鉴真像被护送回

扬州大明寺巡展一周，中国各地前往瞻仰者超过十万人。现代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在唐招提寺绘制了巨幅壁画《涛声》与《山云》以纪念鉴真。著名作家井上靖则把鉴真事迹写成小说《天平之薨》，并改编成戏剧上演。

千百年来，鉴真和尚一直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正如郭沫若先生诗中所赞颂的：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六 弘法大师

——留唐学问僧空海

唐代中国佛教鼎盛，典制完备，高僧如林，因此对日本佛教界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佛教界一方面千方百计邀请鉴真等唐朝高僧前去传经授法，另一方面不断派遣僧人入唐学法取经。据不完全统计，在公元653年以后的二百余年间，见于文字记载的日本学问僧入唐就有一百人左右，超过了入唐留学求法的人数。平安时代初期，日僧入唐留学求法，请益取经之风更盛，携归经典极多。他们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和沟通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弘法大师空海就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人物。

空海（公元774—公元835），佛教法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他俗姓佐伯，日本赞岐国多度郡屏风浦人（今四国香川县）。少年时随舅父赴奈良学习儒学辞章，

十八岁入大学博览经史，可是他不追求高官厚禄，偏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十八岁时就写作《三教指归》，对中国的儒、佛、道三教进行评论比较。二十岁正式出家，拜槇尾山石渊寺名僧勤操为师。795年受戒于奈良东大寺戒坛院。在此后十多年里，他苦心修炼，潜心钻研佛学。为了寻求佛教真谛，穷经问道，他立志西渡到中国求学。由于他对汉学和佛学具有深厚基础，又仰慕中国文化，所以被选中留学唐朝。

公元804年，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受命西渡，大使是藤原葛野麻吕，学问僧空海与最澄及留学生橘逸势等随行。5月12日由唯波津（大阪）解缆出发，7月6日从九州肥前国田浦顺风而行，次日晚遇风暴，空海与大使等乘坐的第一艘船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颠簸于波涛之中，经过四十三天航程，8月10日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福州本来并不是接待日本使船的港口，空海代大使上书：“愿垂柔远之惠，顾好邻之义。”福州刺史阅后大为赞赏，决定给他们提供食宿并奏报长安。过几十天后，朝廷敕令至，大使与空海等二十三人溯闽江、出杭州，循运

河，经苏淮，再沿汴水至洛阳，西入函关，终于于12月21日抵达长安城外长乐驿。唐朝内使赵忠带马二十三匹相迎，由春明门入城，居住在皇城外宣阳坊官宅。次年2月21日藤原大使等东归，空海被敕准留学，居住长安西明寺。这是仿照天竺（印度）祇园精舍所建的唐代名刹，三藏法师玄奘曾在此译经。

805年5月，空海拜长安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真言宗（密宗）第七代传祖惠果为师。师徒相见如故，惠果对空海十分器重，“指其妙颐，教其密藏。”并勉励他学成以后，弘法于东国，流传于天下，“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空海对师傅也是“视之如父，抚之如母”。同年12月，惠果和尚园寂，众僧委托空海为之撰写碑文，言辞恳切，“胸裂肠断。”

空海在唐朝期间，不但钻研佛经而且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向青龙寺昙贞和尚学梵文，又从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书法。他还与许多中国文人名士交往，互相吟诗唱和。中国文士在诗中盛赞空海的才学，如官至淮西节度使、户部尚书的马总的诗中说：“土人

如子稀”，认为像空海这样多才多艺的僧人，在中国也不多见。中国诗人胡伯崇写道：“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把空海比作东汉书法家“草圣”张芝，高度评价他的书法艺术。空海也十分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艺术，同时又关心本国的进步。他在长安游览时曾写出：“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的诗句。当他看到花园里的花与竹时，就想到日本的春天。虽然眼前的风景与日本一样，但耳中听到中国的人声鸟语印象更为新鲜。

空海原打算留学唐朝二十年，但后来为遵循恩师惠果“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度众生”的教诲，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回国。中国友人闻讯，纷纷赠诗送别。如诗人朱千乘送空海归海东的诗中赞美空海：“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并祝福他回国后“承恩见明主，偏沐僧家风。”还以《朱千乘诗》一卷赠给空海带回日本。浙江士子朱少瑞在送空海归日本国的诗中写道：“禅客祖州来，中华谒帝回。”虽然，“归程数万里”，但是“后会信悠哉。”中日友好交流是长远的，相信仍能后会有期。中国僧人昙清的诗中描写空海：“来

朝唐天子，归译竺乾经（即印度佛经）。"并想象他回国会受到殊荣，"到官方奏对，图象到王廷。"另一位僧人鸿渐的诗则祝愿空海返日后，"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诗人郑壬在送别诗中写道："他年续僧史，更载一贤人。"预言空海回国后一定会有卓著贡献，以至名垂青史。空海也向中国友人赠诗告别。

青龙寺义操和尚也是惠果的徒弟，与空海是师兄弟，感情很深。空海在赠别义操的诗中抒发了深厚的友谊和惜别之情：

“同法同门喜遇深，随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

公元806年，空海带着先师的遗愿和大量佛经佛具，结束两年的留唐生活，随遣唐使的船东归。时年三十三岁。他从中国带回佛教经典二百十六部五百六十一卷，佛画十幅，佛具十多种，并在翌年编成《请来目录》献给平城天皇。空海在纪伊的高野山创建了金刚峰寺。823年又以京都的东寺为中心，弘传密宗，创立了日本佛教的真言宗。他还于828年在东寺附近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

种智院，教授各方面汉文化知识，不但有儒学、佛学，还有法学、医学、音乐等知识和手工等技能。以从中国携归的《急就章》等书籍为启蒙教科书。他还亲自主持编成《篆隶万象名义》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汉字词书。综艺种智院为贫苦学生提供食宿，向庶民普及教育。空海把该校开学典礼放在他的中国师父惠果逝世这一天，以表怀念恩师，希望中日世代友好。

多才多艺的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他一生的佛教著作有三百多种五百余卷，对佛学有许多创造性见解。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一书，共六卷二十五节，对从汉魏六朝到隋唐的中国文学理论、诗歌格律作了系统介绍，对传播中国文化，推动日本文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空海在书法艺术上也有很高成就。他认真研究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各种中国书法流派，广泛收集各种碑帖资料，兼擅篆、隶、楷、行、草各体，为日本书法艺术开一代新风，成为日本书道宗师。空海与橘逸势、嵯峨天皇三人，被称为日本平安时代的“三笔”或“三圣”。嵯峨天皇看了空海的书

法作品后赞叹不绝，当即赋诗：

“花苑正开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对之观者日眩耀，共赏草书笑丹青。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没后此僧生。既知风骨无人拟，收置秘府最开情。”

（按：“二王”指中国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现在空海的墨迹《风信帖》等都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与书法有关，空海还把中国笔墨制造的方法带回日本。

空海还依据他的梵文知识，借用中国汉字草书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据说至今日本家喻户晓的《伊吕波歌》，就是空海根据中国草书创作的日本平假名字母表。传说空海还引进中国种茶技术，入唐归来时，携回茶叶献给嵯峨天皇。

835年，六十二岁的空海终老于高野山，后来被授予弘法大师名号。他去世前曾以“入唐求法沙门空海”的名义留下遗言，教导其弟子们要学好汉学，以沟通中日文化，促进中日友好。因此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其弟子园行等继承师父遗愿，参加第十八次遣唐使团赴中国，并特地到祖师惠果墓前敬

献日本带来的供品。弘法大师空海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日本文化所作出的不朽功绩，将永垂史册。

七 裔然献书

——名留青史的入宋僧

宋元时代，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径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宋初来华的日本僧裔然即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中国官修正史《宋史》的《日本传》，竟有一大半篇幅是记载裔然入宋经过及其献书内容的。

裔（diào 刁）然（公元 938—公元 1016），出身藤原氏，家世显贵，其父曾官至五位。他幼时即入奈良东大寺为僧，随该寺高僧学佛经，又从石山寺高僧学习密教，后升到大法位之职。983 年 8 月，裔然及其徒弟成算、嘉应等六人，搭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等回国的商船赴中国。他们在浙江台州附近上岸，10 月获得准许进京，并由台

州使者陪同出发。途中在扬州逗留，裔然一行曾住开化寺地藏院，并访问了鉴真和尚住过的龙兴寺，还拜谒了佛牙。12月到达北宋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984年初，宋太宗赵光义亲自召见了裔然师徒。裔然首先呈献日本铜器十余件及本国书籍《王代年记》与《职员令》各一卷，还有中国的佚（yì 艺）书《孝经郑氏注》等二卷，宋太宗向他垂问日本各方面的情况。裔然虽然不会讲汉语，但却擅长汉字隶书，便在纸上一一笔答。太宗对他甚为器重，赐以中国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准穿用的紫色衣，这是很高的荣誉。后来还授以裔然法济大师称号，并让他们住进汴京太平兴国寺。

唐朝时的人唐学问僧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求法取经，因此一到唐土，首先历访高僧，学习经典，力图带回新的教义流派到日本传布。而宋朝时的人宋僧，却不仅是为取经求法，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修行而来中国朝拜圣迹的。裔然叙述自己入宋的心愿时，就强调自己从天禄以来就有心渡海，可是日本已久停遣使，只好搭乘宋朝的贸易商

船赴宋，以遂此愿。当有中国人问裔然来华目的时，他回答道：“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他表示到中国最大的愿望首先是要参拜日本佛教徒向往的圣地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其次是拜谒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因此他谒见宋太宗时，也当面要求朝拜五台山，获得朝廷批准并赐以执照。裔然一行在巡礼了汴京大小寺院后，便前去参拜五台山国清寺，礼拜智者大师真身堂。他们还到洛阳白马寺访谒东汉时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印度高僧传播佛教的道场，并参观了洛阳龙门大石佛。在华期间，裔然还在汴梁太平兴国寺向印度那烂陀寺的三藏法天学习悉昙梵书，并从梵文直接翻译佛经。

裔然晋谒宋太宗时，介绍了日本的国情，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所以《宋史·日本传》不厌其烦地用一千多字详细记录了裔然介绍的日本知识。裔然通过汉文笔谈告诉宋太宗，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还特别提到《白居易集》七十卷，都来自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文集是九世纪初传入日本的，极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据说嵯峨天皇得到一部

白居易集，如获至宝，当作“枕秘”。醍醐天皇也曾经说过：“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紫式部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也常常插入白居易的诗句。裔然还介绍了日本的物产、风土、人情，“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富有水牛驴羊”，“产丝蚕，多织绢，薄缣可爱。”“四时寒暑大类中国”，“东奥州（即陆奥）产黄金，西别岛（应为对马岛）出白银，以为贡赋。”（《宋史·日本传》）

裔然所谈的日本国体制度使宋太宗听了印象很深。他介绍日本“国王以王为姓，传袭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宋太宗不禁大为感慨，对宰相说：“日本只是岛夷，但世祚遐（xiá 侠）久，它的臣下也能继袭不绝，这正是上古之道也！”而我们中国虽以中华自居，然而自唐末战乱，国内分裂割据，“大臣世袭也很难嗣续。”他表示今后要“日夜励精图治，以建无穷之业。”同时也为了君臣的子孙后代能世袭禄位。

裔然献给宋太宗的《王年代记》是他参考日本史籍并在官署作了调查研究后编写的，记录了日本六十四世天皇的名字、事迹

和平安时代五畿七道三岛六十五州的地理情况。对中国人丰富对日本的认识很有价值。后来杨仁撰《太宗实录》时，就引用了裔然的《王年代记》。《太宗实录》今已失传，但是元末丞相脱脱等编纂宋史当时正是参考了这部书来编写《宋史·日本传》的。另外《职员令》是701年《大宝令》中的一篇制度典籍，其中有关于日本政府二官八省以及中央和地方文武百官的职掌和员额的规定。

中国自唐末五代的动乱以后典籍失散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日本人宋僧往往携带日本保存的中国佚书来中国补足残缺。裔然这次也向宋太宗进献了用金缕红罗缥水晶轴作成的卷子本《郑氏注孝经》一卷和《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中国儒家的经典《孝经》一书在日本很受重视。孝谦天皇甚至曾命令全国每家都要备《孝经》一部，“精勤诵习”。日本还保存了中国出版的各种《孝经》注释书。《郑氏注孝经》是东汉大儒郑玄写的孝经注释。《越王孝经新义》则是唐太宗之子越王贞所撰。这两部书当时在中国已经失传，在日本也成了珍本。

裔然留宋三年，985年7月，裔然随台

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的赴日贸易船回国。入宋僧不但从日本带来中国佚书，同时也从中国运回大量尚未传入日本的佛教经典。裔然就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最新刻本《大藏经》一千多卷。中国刻印全部《大藏经》是根据宋太祖的敕命，从971年（开宝四年）起到983年共花了十二年时间，才在四川成都刻成，这就是世上所称《开宝敕版大藏经》或简称北宋版、蜀版《大藏经》。裔然正好在《大藏经》刻成的这一年晋謁宋太宗，所以宋太宗应裔然请求赐给他的正是敕版《大藏经》的初印本。该书错字较少，印刷也格外清楚。裔然带回的这部《大藏经》原收藏在京都法成寺的经藏里，后来因该寺失火被毁。这部《大藏经》被当时日本佛教界人士经常作为抄经的蓝本，对日本佛典的研究、保存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推动了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唐宋之间，日本的刻板印刷事业几乎处于中断状态，但是从裔然回国后不久，日本的刻版印刷事业又日渐兴隆起来，特别是京都的贵族们常常为了供养而印刷天台经典，如1009年就曾印刷《法华经》一千部，1041年又印《法华经》一千部。裔

然还从中国带回了宋太宗所赐的新译经 286 卷，《宋史·日本传》中遗漏了此事，而随裔然入宋的弟子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有记载。这些新译经也收藏在法成寺的经藏之内。

裔然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在京都嵯峨清凉寺内的旃檀释迦像，现已被定为日本国宝。这尊像是白檀香木精工细雕，高 5.35 尺，相传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身高相同，形象栩栩如生。传说这尊具有奇特印度古代艺术风格的佛像原型本是从印度经西域传来，前秦苻坚征服西域龟兹时带回，为中国历代皇帝珍藏。宋太宗时甚至迎入宫内滋福殿。裔然入宋参拜后非常仰慕，迫切希望仿造一尊带回，便请当时中国雕刻名匠张延皎仿刻一尊。裔然携回日本后，置于清凉寺，引起日本佛教界轰动，唐招提寺、西大寺等寺庙都派人前去模刻。此佛像不仅雕刻工艺独具一格，而且佛体内封存有大量文物，其中许多都是中国僧侣和善男信女施舍的。这是裔然于 985 年 8 月 18 日在台州封存的。一直到后来修理佛像时才发现。如一副绢制的人体五脏模型，是台州

“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的。”这副五脏颜色形状各不相同，在一千多年前解剖学尚未发展的宋代实为罕见，对研究古代东洋医学有重要价值，被定为“新国宝。”在佛体内发现还装有秋罗、纱、文罗、綾等许多不同种类的绢片，对于研究中国北宋时代绢织品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物资料。裔然还带回了一幅十六罗汉画，现藏清凉寺，这是最早传入日本的罗汉画。据说在京都清凉寺殿堂奠基时，裔然还把从中国五台山带回的泥土和他亲手绘制的五台山清凉寺的略图埋在下面。

988年2月，裔然回国二年多以后，又遣其弟子嘉因等乘宋商贸易船来华，并带来礼物，答谢裔然留宋期间所受款待。裔然在《谢表》中回顾自己入宋“诣中华之盛”，得到宋太宗接见，并“恣许荒外之跋涉”，“粗观宇内之瑰奇”。“望尧云于九禁之中”，“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以至满载而归，“佛诏传于东海之东。”表示“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宋史·日本传》）所献礼物有青木函佛经、琥珀水晶念珠、螺

钿书案，倭画屏风、蝙蝠扇、日本刀以及日本书法家藤原佐理的手书等等。其中日本刀和日本折扇、屏风等都是当时中国人士十分喜爱的物品。宋代有名的诗歌《日本刀歌》中曾形容“宝刀近出日本国，鱼皮装贴香木鞘，”“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xáng 嚷）妖凶。”

一千年前裔然人宋前后的事迹，可以看作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八 朱舜水

——流寓日本的明朝遗民

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遗民流亡日本，有的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他们也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业绩。朱舜水就是其中对当时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朱舜水（公元 1600—公元 1682），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因家乡有一条以古代传说中的贤君舜命名的河流，故自号舜水。他自幼好学，是江苏松江府学的秀才。虽然朱舜水满腹经纶，可是看到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慨然断绝做官之念。1644 年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明朝崇祯帝自杀，福王在南京即位后，曾屡次征诏朱舜水，但他见奸臣马士英当道，力辞不就，不料因此受到迫害，只得避走海外，1645 年首次东渡日本。以后朱舜水参加抗清复明斗争，奔

波于闽浙沿海及日本、安南、暹罗诸国，前后十五载，历尽艰辛。1659年，他随抗清名将郑成功北伐，反攻长江流域，兵败后亡命日本。这已是朱舜水第七次东渡了，他见到复明无望，从此流寓不归，直到去世，侨居日本二十多年。

1659年，朱舜水在长崎登岸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厉行海禁，不准外国人入境。筑后柳川藩儒臣安东守约久仰朱舜水的道德学问，便拜其为师，并与一些文人学士联名向长崎镇巡恳求。经长崎镇巡黑川正直报告萨摩藩和幕府批准，破例允许留居。当时朱舜水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孤身漂泊，囊空财尽，难以维持生活。安东守约节衣缩食，拿出自己微薄薪俸中的一半接济老师。朱舜水表示“于心不安”，加以推辞，安东却说：“如果自己的生活优于老师，心中会更加不安。”1663年长崎火灾，朱舜水的住房也被烧毁，安东守约闻讯急忙赶到长崎慰问，并说：“如果让老师饿死，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呢”！舜水感叹像安东守约这样品学超群的人才，即使在中国也是少见的。师生两人志同道合，情深义重，在一

起便日夜以读书讲道为乐。安东守约在朱舜水的精心教导之下，果然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

1664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孙子，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又称源光圀，guó 国），听说朱舜水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特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拜访，第二年正式礼聘朱舜水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德川光圀好学不倦，礼贤下士，待朱舜水以宾师之礼，恭敬求教，经常向他请教或商讨国家施政方针、礼乐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学术等方面问题。朱舜水也知无不言，侃侃而谈。1669年，朱舜水七十诞辰，德川光圀特地在江户后乐园内为其祝寿，并赠以绘有太公望等六位中日先哲画像的屏风。1679年，朱舜水八十大寿，光圀又登门祝贺。舜水不忘祖国，终生身穿明朝服装，寿辰那天设香烛拜告天地，身在异邦，心念故乡，痛哭流涕。光圀也深受感动，便下令奏古乐以示安慰。1682年，朱舜水以八十三岁高龄在日本逝世。德川光圀悲痛不已，甚至宣称：“先生死后，我想世上再无这样的学者了。”并把朱舜水的遗体按明朝礼仪建坟，

安葬在本家墓地常陆久慈郡太田乡瑞龙山麓（今茨城县常陆太田市）。并亲自题写墓碑：“明徵君朱先生之墓”，私谥为文恭先生。他的遗物被保存在水户彰考馆里，供人瞻仰。以后又建造了朱舜水的祠堂，周围种植了他最喜爱的樱花，每逢忌日，必致祭礼。

朱舜水提倡实学，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学问之道，贵在实行。”（《朱舜水集》）认为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政治，“能变化子民风土俗。”他反对程朱理学一味究心谈性空谈虚论的学风。他的这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思想界尤其水户学派影响很大。他还重视史学，主张总结吸取历史上国家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1672年德川光圀开设彰考馆，召集学者编纂鼓吹“尊王统一”的《大日本史》，第一位修史总裁就是朱舜水的弟子安积觉。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以强调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对幕末维新志士尊王倒幕思想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朱舜水也十分注重教育，认为“学校诚

为天下国家之命脉。”大力推动江户时代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对儒臣小宅生顺说：“兴国学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更为重要，我对此寄予期望。”他在日本讲学二十多年，对自己的学生和前来求教的人，始终是满腔热忱，有问必答，诲人不倦。至今留下了朱舜水与日本各界人士的大量问答笔录，从经史文学、典章制度、修身处世、山川风物、农田播种，直到国家之法，学问之方、简牍之式、器具之制，事无巨细，无不尽力给予耐心的讲解和精辟的论述。直到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经常头昏手颤，可还是坚持为学生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解难。他讲课具有针对性和感染力，常使学生听完豁然开朗。以至连一些白发老人也扶杖前来听讲，有的则是父子同人门下。由于朱舜水在水户讲学、声望远播，连加贺等藩也慕名派学者来请教。日本学者文人都尊敬地称他为“朱夫子”或“舜水先生”。他教育培养的学生英才辈出，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有名学者。如安积觉、栗山愿、佐佐宗淳、人见传等人曾担任彰考馆修史总裁等职。舜水教学要求严格，如安积觉幼时曾随

他学习汉语“其课程严峻，晨读夕诵，结果至老而不忘”。至今日本天理图书馆还珍藏着朱舜水为安积觉制定的功课表——“逐日功课自实簿”手迹原件。

朱舜水既是一位才学超群、博古通今的学者，又是懂得科技、擅长工艺的技师。他积极地把中国的有关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学种痘等科学知识技能介绍给日本人民。朱舜水在江户的小石川模仿中国西湖等名胜设计了后乐园的石桥等景，成为日本著名的园林之一。他还应德川光圀之请，作《学宫图说》，并设计出图样，让本匠制成相当实物三十分之一的木制模型，甚至有时亲自动手操作。这个学宫模型中有文庙、明伦堂、尊经阁、学舍等，十分精巧，至今还保存在水户的弘道馆里。后来东京汤岛的圣堂，就是按这个模型制造的。朱舜水与日本一些民间匠人也有交往，有时还亲临指导，授以技艺，以至有的日本人误以为他是“南京的漆工”。

朱舜水虽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但他同时也反对轻视外国的华夷思想。他表示自己视日本与中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

异于中国也。”对日本人民，“如一家昆弟父子”。而批评那种以为中国一切胜于外国的论调是“眼界逼窄”的陋识。他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在多年侨居日本并与日本人民长期相处中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山川降神，才贤秀出”的国家。诚恳地希望日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早日繁荣富强。朱舜水大力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处，亲如一家，世代友好。在给安东守约的信中希望日本“与中国世世通好，若汉赵之交。”并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也“动关中国、日国千年之好。”

朱舜水正是以自己的身教与言教，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也赢得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崇敬。

九 魏源与象山、松阴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日 进步思想家

十九世纪中叶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中日两国先后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门户，在炮口下实现了开放，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东亚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一批介绍世界史地和论述鸦片战争的中国著作传入日本，很快被翻印、翻译而广泛流传，在日本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对日本了解西方文化和维新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国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魏源的著作对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一批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

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鸦片战争及战后闭关大门的开放，也使他们能够通过搜集传入中国的外国报刊、书籍和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探听等方式，获得许多西洋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公元 1794—公元 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就读岳麓书院，1822 年考中举人，长期担任江苏地方官的幕僚和州县官。有大量著述和诗文传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841 年 6 月，曾任钦差大臣领导广东禁烟和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遭到投降派打击陷害，在革职流放途中，经过镇江，会见了好友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彻夜对榻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编成的《四洲志》手稿，和其他一些摘译的外国资料，都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纂一

部新书。魏源受托后立即动手，埋头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还征引了历代史志十四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七十多种，以及各种奏折等其他史料，终于在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以后他又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六十卷，1852年又增加到一百卷。百卷本全书约八十八万字，并有各种地图七十五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四十二页。其内容除了包括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夷情备采》三卷和关于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图说十多卷。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关于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此外，魏源还著有记述清代历次战争的《圣武记》等书。

魏源的著作，作为清代中国赴日本贸易商船带去出售的中国书籍传入了日本。根据长崎图书馆保存的江户时代进口中国书籍的原始记录，可以查到魏源的《圣武记》一书最早是1844年由中国的商船带进一部，被老

中（幕府将军以下最高级官员）阿部正弘买去。1845年又输入一部，为老中牧野忠雅所购。1846年，中国商船带去三部，分别被老中青山忠良和户田忠温买去，可见当时日本幕府执政者对《圣武记》的重视。魏源的《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1851年，由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去三部。但是由于发现书中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根据幕府法令要上交处理，后来其中两部由官方御文库和学问所征用，另一部被关心世界形势的老中牧野忠雅买去。第二年，又输入一部《海国图志》，由长崎会所保存。1854年，中国两艘商船一共带去《海国图志》十五部，被官方征用七部，在市场上出售八部。到1859年，由于《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已经涨了两倍多。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仅仅从1854到1856年这三年之内，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二十一种，其中翻刻本（按原文刻印）和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有

六种，和解本（日文译本）有十五种。一部著作在出版后短短几年内，竟然在另一个国家出现这么多种版本的译本，这恐怕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也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附录》、《他山之石》等好几种版本的翻刻本。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什么会引起日本人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海国图志》等书使他们大开眼界，不仅提供了大量世界史地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这对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势又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急于加强海防的日本人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因此日本人士称其为“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可以说《海国图志》等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佐久间象山（公元 1811—公元 1864），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他是信浓国松代城人，

姓佐久间，名启、号象山，据说是为了仿效中国宋朝的哲学家陆象山。他曾在江户开办私塾象山书院，兼教汉学和洋学，并传授兵学与炮术。1854年，因鼓励学生吉田松阴偷渡海外而被牵连入狱七个月，在狱中写了《省𡵚（qiān 牵）录》。在这部书中，佐久间象山曾经谈到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圣武记》以后的感想。他说：1842年，信州松代藩主真田幸贯任老中，管理海防之事，当时正值发生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他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幕府“上书陈策”（即著名的《海防八策》）。后来，象山读到了魏源的《圣武记》，发现这部书同样也是“感慨时事之所著。再看魏源写的《圣武记序》，作于1842年7月，仅比他11月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佐久间象山不禁感慨万千，拍案称奇：“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省𡵚录》）

佐久间象山虽然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却并不是盲目全盘接受魏源的一切观点，而

是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海防主张。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认为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佐久间象山大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改革内政、批判幕府的锁国与腐败，倡导尊王开国论，最后在 1864 年被攘夷派刺杀。魏源与佐久间象山的思想，都是在西方侵略冲击之下产生的爱国主义革新思想。他们分别成为中日两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两人真是名符其实的“海外同志”。

另一位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著名的维新志士、尊皇攘夷论的倡导者吉田松阴（公元 1830—公元 1859）。他姓吉田，名矩方，号松阴，长门国萩城人。他早年在九州游学时曾从别人处借阅了魏源的《圣武记》一书，对魏源要对付外敌“必先洞察夷情”的观点产生强烈的共鸣。1854 年，他企图利用美舰来日的机会，冲破锁国铁幕，到海外求学，不幸偷渡美舰失败被捕，囚禁于野山狱中。松阴在狱中仍不忘探索救国之道，读

了很多书，写了《野山狱读书笔记》，其中多次提到读魏源《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他认为《筹海篇》所议守、战、和，非常中肯，如果能按此执行，足以对付英法和俄国的侵略。他还针对日本当时面临的形势指出：当前俄、美、英、法，纷纷来骚扰日本，所以传入魏源的书，广泛流行，是十分及时的。

吉田松阴对魏源的某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魏源认为俄、美、法都憎恨英国，因此中国可以得到他们的水陆援助。吉田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列强往往“见利舍义”，只要有利，便可以与敌人同盟，反以同盟为敌。他举例说：如俄国与土耳其开战时，英法就曾一起援助土耳其（指克里米亚战争），可见魏源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仍有“不当之处”。1855年末，吉田松阴虽然出狱，但仍被幽禁，他便在囚室对前来求教的青年讲学。1856年才得到长州藩政府的许可，兴办松下村塾，学生来自武士、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培养出像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著名维新志士以及本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

文等维新元勋。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等书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一方面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尊皇攘夷讨幕维新的主张。最后在 1859 年的“安政大狱”中，被幕府处死，就义时年方三十岁。

佐久间象山与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的杰出维新思想家，他们一面热心地从魏源著作中吸取世界史地知识和反侵略斗争经验，同时又从日本实际出发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可取的态度。

十 罗森及其《日本日记》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自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除了少数赴日贸易商船以外，互相往来很少，给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史料的话，仍然可以发现某些先驱者的事迹，例如随美国培理舰队到日本，并写下中国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的广东人罗森，已经用他的活动和著作，谱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最初的篇章。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海军准将率领四艘美国军舰组成的远征舰队，驶进了日本德川幕府所在地附近的江户湾（今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蒸汽轮船又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他们叫做“黑船”。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总统的

国书，并答应明年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理舰队再次开入江户湾，幕府只得派代表与培理在横滨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从黑船上下来的美方人员中有一位中国人。当时日本画师锹形赤子曾奉命为美方人员画像，其中就有一个圆脸，拖着长辫，戴着瓜皮帽，手持折扇、矮矮胖胖的中国人，旁边写着“清朝人罗森”。另外还有几幅他打伞、摇扇和写字姿态的画像。在当时参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员的笔记、日记和双方会谈记录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罗森的名字和记载。

那末，罗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与培理舰队一起来日本的呢？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县文人。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卫廉士是培理舰队日本之行的翻译官，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他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感到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便接受邀请同赴日本。

在拥有七艘军舰一百多门大炮的美国舰队的武力威胁之下，日本幕府被迫接受培理提出的各项要求。1854年3月，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根等港口，美国还可以派领事驻下田。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敲开了。罗森是日本开国的目击者，他曾通过汉文与日方代表、官员笔谈并翻译双方文件（有关条约的文件一般均有汉文本）。

罗森在日本期间还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除官员外还与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崇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日本日记》）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为日本人写了五百余幅扇面，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今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

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即用嘴衔笔写字），也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恐怕是近代最早的中日书法交流了。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把自己写的记述太平天国的著作《南京记事》一书借给日本官员平山谦二郎阅读。第一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接近真相的详细介绍。这部著作后来被吉田松阴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1859年3月，罗森在横滨宾馆与日本官员笔谈时，还纠正了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误传。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朝皇帝并未逃往朝鲜等等，并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略表同情的倾向。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在他的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一位日本官员向他赠诗：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

边。”

在下田曾经有一位日本人问罗森：你是中国士人，为什么要去当西洋人的翻译呢？罗森便以诗言志，写了一首七律诗回答他，最后四句是：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豪情，表达了罗森要走向世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远大志向。在离开日本前夕，罗森与日本友人们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人诗句录扇以作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也吟诗相答，并书于扇面，诗中写道：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罗森在访日期间，还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具有很高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日本游记。1854年8月当他随培理舰队回到香港后，就把自己写的这部游记题为《日本日记》，

交给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刊登。在 1854 年十一月号、十二月号和 1855 年一月号上分三期连载。《遐迩贯珍》的编者在前面还加上按语，说作者是编者的“平素知己好友”，刊登这篇日记可以增加读者的知识，使大家“耳目为之一新”。

罗森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日本横滨、下田、箱根（今北海道函馆市）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人民也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他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无有鼠窃狗偷之辈。”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也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在横滨，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一次竟能举起二、三包二百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叹：“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赞美一位日本少年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聪明俊秀，招人喜欢。

由于罗森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的活动，因此他的《日本日记》也是研究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森还记载了《神奈川条约》签订后，

培理在美舰上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美方送给日本政府的一批近代化器械，在横滨公开展览，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以惊异赞美的语气对火车、汽艇、电报机、照相机等一一加以描绘。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不少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初次所见，因而倍觉新奇，罗森的描述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罗森的《日本日记》还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并收集了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多首，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在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人到过日本，但其中大部分是官员、商人、水手，偶尔也有少数文人、画师、和尚、医生等，却很少有人留下日本游记。清初以来，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篇》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但汪鹏的活动仅限制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很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根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东亚历史的转折关头。

因此他的《日本日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史学、文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罗森后来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政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赴欧途经香港时，曾在旅馆与罗森会晤，第二天罗森还到柴田乘的船上话别，并送他七本书。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日两国之间交往十分稀少之际，罗森来到日本，并进行许多友好交流活动，还写下了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这位先驱者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十一 黄遵宪与源辉声

——清代中日文人的交往和笔谈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同时也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871年9月，中日双方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伊达宗成经过会谈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决定正式建交，互开口岸，通商贸易，并互派外交官。设立使领馆，这就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此，中日人员交往频繁，两国的官员、文人来往不绝，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佳话。

1871年中日建交后，日本不断派遣使节和外交官来华，清政府直到1877年1月才正式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11月27日何如璋率第一届驻日使团乘海安轮从上海出发，30日抵达长崎，长崎

炮台鸣礼炮二十一响并升起龙旗致敬。使团在长崎、神户等地都受到华侨和日本群众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正式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不久即选择环境幽静秀美的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作为中国公使馆临时馆址，开展各种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

在第一届中国驻日使团中，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人物，并非公使何如璋，而是首任参赞官黄遵宪，他不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和维新思想家、政治家。

黄遵宪（公元1848—公元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今广东梅县）。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不满封建科举制度，而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到过广州、香港、天津、烟台等商埠，见识较广，眼界开阔。黄遵宪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不顾亲友们的阻拦和惋惜，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他是首届驻日使团中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不仅负责

与日本外务省及各界人士的联系，而且使团与日本方面的交涉照会及向清政府的报告，也常常由他起草。

作为一个外交官，黄遵宪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日本统治集团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始终据理力争。他在一首诗中指出中日两国：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和杰出的诗人，黄遵宪风尘仆仆漫游日本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人士。他还常常与日本诗人唱和诗篇，通过口说笔谈吟诗题字宣传中日友好，弘扬中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并和许多日本人士结下深厚的友谊，仅仅在他的诗文中提到的日本朋友就有数十人之多。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则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黄遵宪到日本后细致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俗风

习，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一百多首“杂事诗”。每首都是七言绝句，内容广泛，短小生动，活泼有趣。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他的《日本杂事诗》1877年由清朝总理衙门出版初刊本，收诗一百五十四首。以后又有各种版本，至1890年他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又把它增订成定本，共二百首，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日本杂事诗》上卷主要写日本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等方面，下卷则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如第一首诗生动地概括了日本史地：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有一首诗形容日本的名胜富士山也极为形象：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另一首描写日本人观赏樱花的景象，也十分动人：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除了《日本杂事诗》外，黄遵宪还写了咏颂日本国花的长诗《樱花歌》，记录京都传统风俗的《都踊歌》和歌颂维新志士的《近世爱国志士歌》等许多有关日本的诗歌，收录在《人境庐诗草》之中。黄遵宪通过他的诗歌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灵，加深互相理解和友谊，也深深博得中日人民的喜爱，以至“新诗脱口每争传。”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还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他从1879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至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万字。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类。这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中日文

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鼓吹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闪耀着异彩。

在明治初年，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人学者在日本尚享有很高声誉。中国驻日公使馆建立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竞相与中国使团人员笔谈交欢，或以诗酒翰墨共乐。源辉声就是常来的日本人之一。源辉声（公元1848—公元1882），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大河内辉声或源桂阁。他原是日本世袭高崎藩主，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任高崎知事，因不赞成新政而辞官归乡，以后长期闲居东京墨江畔。源辉声精通汉诗、汉学，嗜爱翰墨，广交文士，尤其喜欢与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特别是中国公使馆的官员用汉文笔谈，并以此为乐。他对中国人十分尊重，而且不分长幼贵贱，一视同仁。从公使、参赞一直到仆役、孩子，都与之笔谈。甚至遇到使团会讲日语的翻译，也自称不善言谈，宁肯“以一枝笔换千万语言。”因为笔谈可以留下墨迹作为纪

念，所以他每次去中国公使馆都准备好笔谈用纸，一问一答都写在上面，当天晚上就把这些纸裱好，精心保存起来，然后按顺序编排装订成册。这些珍贵的笔谈手稿一直保存至今，统称为《大河内文书》，共计有数百次笔谈，达九十六卷之多。

《大河内文书》中的这些中日文人的笔谈内容涉及中日两国的政治、学术、文化、风俗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几乎是无所不谈。由于是私下随便交谈，故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并无一点掩饰与做作，颇能反映笔谈者们真实的思想与生活。源辉声在许多笔谈上还注明了时间、地点、在场人物，有时甚至还记下他们动作、表情，读起来犹如一部演出用的剧本，观笔谈如见其人，声音笑貌，栩栩如生。例如有一次关于文学艺术的笔谈，黄遵宪称赞《红楼梦》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可惜日本人不通汉语，“不能尽得其妙也。”源辉声则介绍日本的《源氏物语》用意相似，你写荣国府、宁国府，我则写宫廷之情。而且作者紫式部是一位才女，此事可能会使曹雪芹吃惊。黄遵宪说遗憾自己不通日语，没有读过《源氏物

语》。但看到日本民间几乎人手一册，我想其中“必有妙处”。在笔谈中还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向黄遵宪请教写诗、作文及书法、读书。同时黄遵宪等也经常向日本人士了解日本历史、制度、风俗、典籍，有时还请他们帮助翻译日文资料。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人士的推崇喜爱，因此源辉声请求黄遵宪把一部分诗稿赠他收藏，黄遵宪答应把部分手稿埋在他家的院子里，以为“稿冢（zhǒng种）”。于是在1880年正式树碑立冢，碑面刻着黄遵宪亲笔书写的“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大字。背面刻有源辉声所撰写的“葬诗冢碑阴志》记述了自己与黄遵宪的交往、友谊以及葬诗树碑立冢的经过。其中记载石碑刻成之日，源辉声设宴畅饮，黄遵宪亲自把诗稿藏在袋里埋入土中，并洒酒吟诗：

“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

源辉声接着和诗道：

“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

为邻。”

诗冢原在东京墨江畔源氏旧宅，后来源辉声去世后，其子迁于其父墓葬地埼玉县平林寺。

中国诗人的手稿，埋葬在日本的国土上，这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多么真挚感人的情谊啊！

十二 留日热潮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热”的盛况：“学子互相约齐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中国人蜂涌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

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留学的情况。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资金，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构成了一幅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奇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尤其是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救亡图存。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其次，清政府提倡和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 1898 年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 年

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在日本大、中学毕业者经过考试，也授以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出洋留学成了知识分子重要出路。清政府还鼓励官费、自费并举，推动了留日热潮的发展。

第三，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形成留日热潮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吸收中国留学生，即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与沙俄争夺远东霸权。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特别开设了一批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来，具有地理位置接近，来往交通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等便利条件。

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

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十三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至1899年各省派赴日本留学的已有一百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达一千三百余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八千多人，留日热潮达到高峰。以后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制》，对中国留学生制订种种限制和歧视措施，引起留日学生的反感，不少人愤然回国，有的国内学生也因此取消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学过日语才准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还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任教，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日本教育经费削减而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却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此

1908—1909 年留日学生降到五千多人，1910 年只有四千左右。到 1911 年武昌起义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只剩一千多人。

十九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相当于中学性质）较多，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学到大学毕业的就更少了。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急于求成，归国报效，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也有少数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

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使他们受到刺激更深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有时穿着中国服装留着长辫的留日学生走在街上，竟有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嘲骂。有的留日学生经过马关订约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不禁痛哭流涕，愤不欲生。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们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因此，二十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中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爱国热潮。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举行的十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二十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

势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还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

中国留日学生办刊物始于1900年冬天创刊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初（1900—1911），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反映了当

时的形势和时代脉搏，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到了日本，学了日文，读到不少日文书，急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于是便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他们不仅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刊载日本著述的译文，而且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大量著作，及西方著名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日文版的中文译本。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还创办了教科书译辑社，译编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各省新式学堂采用。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杨度、黄兴等组织了湖南编译社，发行刊物《游学译编》，同时也翻译出版各种日文著作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903年留日学生范迪吉等选译了《普通百科全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一百余种。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发行的《闽学会

丛书》也是以翻译日文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日文书就有三百多种，占当时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

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引进了大量日语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其中有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如混凝土、俱乐部等。大量是日本人意译外来语的音读汉字，如出版、原子、哲学、阶级、主义等。还有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如腺、胚等。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引进的词汇至少有八百多个。

总之，在二十世纪初，从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先后共计有数万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二十世纪初的留日热潮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

十三 鲁迅与藤野先生

——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二十世纪初以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接触日本各阶层群众，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日本人民，尤其是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他们的日本老师，建立起深厚友谊。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感人的事例。

1931年12月2日，鲁迅给特地来上海向他请教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赠诗一首：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短短的四句诗，表达了鲁迅对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情景的追忆，也抒发了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鲁迅从

1902 年到 1909 年，即 22 岁到 29 岁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七年又四个月之久，可以说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仙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 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他 1902 年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作为南洋官费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1902 年 4 月到东京，进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学习，编入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入学不久，他就拍了一张身穿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寄给他弟弟周作人。背后的题词非常幽默风趣：“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sháo 勺）仲弟之英盼。”尽管当时宏文学院条件并不算好，八个学生挤住一间寝室，夏天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但鲁迅顽强刻苦，毅力惊人，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当然，鲁迅也并非只顾埋头读

书，他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革命活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曾经到校长嘉纳治五郎设立的讲道馆练习过柔道。1903年春，鲁迅不顾留学生监督停发公费的威胁，毅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决裂。他还秘密加入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并经常与友人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等问题，为浙江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写稿。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并要求到离东京较远尚未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当时只有九万多人口。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情况，过去记载较少。仙台的日本朋友于1973年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经过四年多调查，最后编成了包括一百七十多幅照片图表和四百七十多件文字资料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资料集，再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学习生活的真实风貌。资料反映出鲁迅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得到了不少日本老师的亲切教导，同学们的热情关心以及

房东和其他仙台市民的帮助照顾。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情谊。藤野严九郎先生（1874—1945），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后来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研究解剖学。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刚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即副班主任）。鲁迅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他第一次见到藤野时的印象：“其时进来的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藤野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他对班上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很关心，“对其对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用功之方法、日语之说法、笔记之写法等”，都经常给予指导，提供便利。藤野先生曾回忆说：“周君身体不太高，圆脸、很聪明的样子，但看来气色有些不太健康，由于

语言关系，学习上也有困难。”他看到周树人上课记笔记有些吃力，就在课后检查他的笔记，耐心细致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据鲁迅回忆：解剖学课程开始一月后的一个星期六，藤野先生派助手叫他去，并要走了他的听课笔记。过两三天后还给了他。鲁迅这样描述了他翻阅送回来的笔记时的感动心情：“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从这以后，藤野先生每周都让周树人送来笔记，进行修改，一直继续到他所担任的课程结束。鲁迅回国以后，把藤野先生改正过的笔记装订成三厚册，精心保存。至今仍收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中。

藤野严九郎教授为什么能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国人的情况下这样关怀爱护中国留学生呢？这是与他热爱和尊崇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在藤野先生后来写给学生小村茂雄的信中谈到“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

人们的心情。”

周树人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和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关心爱护，却引起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对中国人持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竟造谣说解剖学试题是藤野先生预先在他的讲义上作了记号，还给他写了匿名信，并要检查他的笔记。对此鲁迅后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使他受到更大刺激的则是二年级的细菌学课上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竟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探子，被日军捕获将要处死，而一群中国人却在四周围观的画面。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学生看了还鼓掌欢呼万岁。这给鲁迅极大的震动，原来以为学医可以医治中国人的疾病，现在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觉醒；即使身体再健壮，也只能成为杀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所以鲁迅决定放弃学医，而用文艺作武器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当1906年春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便毅然从仙台医

专退学。

鲁迅离开仙台前，铃木、杉村等同班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并合影留念。藤野严九郎先生也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并送他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上“惜别”两字。鲁迅在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三年后，于1909年8月回国。他始终珍藏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张照片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还写了《藤野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和藤野先生自仙台分别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是彼此都没有忘记，都在想念对方。鲁迅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yǎo 咬）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知道自己学生的消息。在他

写的《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说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遗憾！我因为住在农村，社会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了鲁迅逝世消息，深感悲痛。……在此谨对因我的一点点照顾那样感恩不尽的周君之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祝他家属身体健康。”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45年8月去世。

1960年，日本人民为了永远纪念鲁迅这位曾在仙台留学过的中国文豪，在广濑川畔青叶山下风景秀美的地方，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1964年，日本朋友又在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足羽山山巅上建立了一座藤野先生纪念碑。把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那张照片头像和“惜别”两字放大后刻在石碑上，碑文“藤野严九郎碑”六字乃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所题。这两座纪念碑，既是记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的纪念碑，也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里程碑。

十四 宫崎滔天

——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1925年，孙中山领导的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得到不少日本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宫崎滔天就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他不仅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中国革命者有着深厚情谊，而且创办《革命评论》，与《民报》密切配合，并肩战斗，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赞颂的佳话。

宫崎寅藏（1871—1922），原名虎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开明豪爽，曾设击剑道场。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

主义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弥藏主张帮助中国革命，都对他有很大影响。1897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赞叹“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诚挚！”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第一次向日本民众公开介绍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同年11月，宫崎还邀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十天。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奔走筹措经费和军火，并毅然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起义失败后，滔天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维持生活。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着重叙述自己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两国进步青年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称他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

1905年8月20日，宫崎滔天参加了中

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破例吸收为同盟会会员，他还把自己在东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所址，并在门口挂上民报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宫崎滔天邀集萱野长知等日本同志，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革命评论》从1906年9月创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十期。该刊辟有中国革命大势、东亚记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专栏。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讴歌与声援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留学生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觉醒，中国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国留日学生“已怀激烈的革命思想，他们的两大主义是建设共和与平均土地，实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他还撰文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革命评论》社与《民报》社之间有着深厚友谊，《革命评论》刊头就是由《民报》主编章太炎亲笔所题。《民报》与《革命评论》还经常互相刊登大幅广告。《革命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民报》的六大主

义，并向日本人推荐，“欲知中国之新思想，中国民间之实际乃至革命党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读《民报》也”。从《革命评论》刊登的“编辑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与《革命评论》社同人互相来往拜访、宴请欢聚的热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革命评论》社全体成员都到会祝贺。会上黄兴请宫崎滔天讲话，并介绍说：“君赞助我国革命事业，备尝艰难险阻，百折犹不挠其志”。全场欢呼声雷动。滔天也当场慷慨陈词，愿以牺牲生命赞助中国革命。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动人。《民报》和《革命评论》都对这次盛会作了详细报道。

《革命评论》受到中日两国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在“飞雁纷纷”专栏里刊登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来信称，读完该刊“痛快无比”。《民报》、《万朝报》、《新世纪》等中日报刊也来函祝贺。一些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写信或作诗表达其感情。一封来信说拜读贵报“不禁无限热血奋起，三呼万岁。”

同盟会员陈家鼎写了《读革命评论有感》诗十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
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1907年《革命评论》停刊后，宫崎滔天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亲自签发委任状，委托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不辞辛苦、贫穷和危险。有一次，日本东京神乐坂警察署的署长设宴招待，企图收买他，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况。宫崎滔天当场义正辞严地给予拒绝。孙中山闻讯，特地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赞誉宫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节可风”。信上还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孙中山决定把这件事向中国革命党的同志们广泛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

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凤乐园餐馆吃饭，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象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

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和肖植藩（即肖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

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 十五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中国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勤奋好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该校聘请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十余位日本教师任教。尽管吉野作造在该校教课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李大钊一直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据吉野在东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伊藤武雄回忆：

1921年秋，当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吉野先生身体健康吗？我是先生在天津教过的学生。”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曾在自己主编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绍明末遗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赞扬朱舜水的爱国精神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通过课堂听课和广泛阅读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报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辜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很大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15年留日学生集会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会上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

吉野作造（1878—1933），日本宫城县人。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07—1909年应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广泛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成为以反对军阀专制、拥护宪政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导者。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每周评论》。同月，吉野作造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进步团体黎明会。《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并刊登了吉野从东京寄来的希望互相“遥为声援”的信。《每周评论》第7号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第9号上刊载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1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创刊，吉野立即寄给李大钊，十天以

后，《每周评论》23号上就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在《忠告黎明会》一文中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大多数日本报刊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大肆诬蔑咒骂。而吉野作造等日本进步人士，却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侵略主义的日本不但为贵国青年所反对，也是我们所反对的。“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中所引用，并赞扬吉野的信使“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国人民心坎中要讲的话。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日本《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

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如在《中央公论》1919年6月号上刊登的《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报刊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种种责难。在《新人》6月号上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中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中央公论》7月号和《东方时论》7月号的文章中，吉野严厉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阐述日中两国人民只有在反对两国官僚军阀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亲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许多观点是和李大钊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声援中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

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1920年5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

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

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放,也使他们能够通过搜集传入中国的外国报刊、书籍和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探听等方式,获得许多西洋知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现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曾就读岳麓书院,1822年考中举人,长期担任江苏地方官的幕僚和州县官。有大量著述和诗文传世,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841年6月,曾任钦差大臣领导广东禁烟和抗英斗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遭到投降派打击陷害,在革职流放途中,经过镇江,会见了好友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彻夜对榻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编成的《四洲志》手稿,和其他一些摘译的外国资料,都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纂一部新书。魏源受托后立即动手,埋头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还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种,以及各种奏折等其他史料,终于在1842年12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他又

陆续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其内容除了包括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四卷,以及《夷情备采》三卷和关于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论述、图说十多卷。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关于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当时一部内容最丰富的有关世界知识和海防的百科全书。此外,魏源还著有记述清代历次战争的《圣武记》等书。

魏源的著作,作为清代中国赴日本贸易商船带去出售的中国书籍传入了日本。根据长崎图书馆保存的江户时代进口中国书籍的原始记录,可以查到魏源的《圣武记》一书最早是1844年由中国的商船带进一部,被老中(幕府将军以下最高级官员)阿部正弘买去。1845年又输入一部,为老中牧野忠雅所购。1846年,中国的商船带去三部,分别被老中青山忠良和户田忠温买去,可见当时日本幕府执政者对《圣武记》的重视。魏源的《海国图志》首次传入日本是1851年,由

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带去三部。但是由于发现书中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根据幕府法令要上交处理,后来其中两部由官方御文库和学问所征用,另一部被关心世界形势的老中牧野忠雅买去。第二年,又输入一部《海国图志》,由长崎会所保存。1854年,中国两艘商船一共带去《海国图志》15部,被官方征用七部,在市场上出售八部。到1859年,由于《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已经涨了两倍多。

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仅仅从1854到1856年这三年之内,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种,其中翻刻本(按原文刻印)和训点本(在汉文上下旁边加上训读符号或假名)有六种,和解本(日文译本)有15种。一部著作在出版后短短几年内,竟然在另一个国家出现这么多种版本的译本,这恐怕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见的。魏源的另一部名著《圣武记》在日本也有《圣武记采要》、《圣武记附录》、《他山之石》等好几种版本的翻刻本。

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什么会引起日

本人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海国图志》等书使他们大开眼界，不仅提供了大量世界史地知识，而且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这对于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势又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急于加强海防的日本人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因此日本人士称其为“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可以说《海国图志》等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尊皇开国论的倡导者。他是信浓国松代城人，姓佐久间，名启，号象山，据说是为了仿效中国宋朝的哲学家陆象山。他曾在江户开办私塾象山书院，兼教汉学和洋学，并传授兵学与炮术。1854年，因鼓励学生吉田松阴偷渡海外而被牵连入狱七个月，在狱中写了《省轡〔qiān 牵〕录》。在这部书中，佐久间象山曾经谈到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圣武记》以后的感想。他说：1842年，信州松代藩主真田幸贯任老中，管理海防之事，当时正值发生英国

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他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幕府“上书陈策”(即著名的《海防八策》)。后来,象山读到了魏源的《圣武记》,发现这部书同样也是“感慨时事之所著”。再看魏源写的《圣武记序》,作于1842年7月,仅比他11月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佐久间象山不禁感慨万千,拍案称奇:“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省悟录》)

佐久间象山虽然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却并不是盲目全盘接受魏源的一切观点,而是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海防主张。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认为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佐久间象山大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改革内政、批判幕府的锁国与腐败,倡导尊王开国论,最后在1864年被攘夷派刺杀。魏源与佐久间象山的思想,都是在西方侵略冲击之下产生的爱国主义革新思想,他们分别成为

中日两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两人真是名符其实的“海外同志”。

另一位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著名的维新志士、尊皇攘夷论的倡导者吉田松阴（公元1830—1859年）。他姓吉田，名矩方，号松阴，长门国萩城人。他早年在九州游学时曾从别人处借阅了魏源的《圣武记》一书，对魏源要对付外敌“必先洞察夷情”的观点产生强烈的共鸣。1854年，他企图利用美舰来日的机会，冲破锁国铁幕，到海外求学，不幸偷渡美舰失败被捕，囚禁于野山狱中。松阴在狱中仍不忘探索救国之道，读了很多书，写了《野山狱读书笔记》，其中多次提到读魏源《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他认为《筹海篇》所议守、战、和，非常中肯，如果能按此执行，足以对付英法和俄国的侵略。他还针对日本当时面临的形势指出：当前俄、美、英、法，纷纷来骚扰日本，所以传入魏源的书，广泛流行，是十分及时的。

吉田松阴对魏源的某些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魏源认为俄、美、法都憎恨英国，因此中国可以得到他们的水陆援助。吉田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列强往

往“见利舍义”，只要有利，便可以与敌人同盟，反以同盟为敌。他举例说：如俄国与土耳其开战时，英法就曾一起援助土耳其（指克里米亚战争），可见魏源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仍有“不当之处”。1855年末，吉田松阴虽然出狱，但仍被幽禁，他便在囚室对前来求教的青年讲学。1856年才得到长州藩政府的许可，兴办松下村塾，学生来自武士、商人、农民等各个阶层，培养出像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著名维新志士以及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维新元勋。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等书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一方面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尊皇攘夷讨幕维新的主张。最后在1859年的“安政大狱”中，被幕府处死，就义时年方30岁。

佐久间象山与吉田松阴是日本幕末的杰出维新思想家，他们一面热心地从魏源著作中吸取世界史地知识和反侵略斗争经验，同时又从日本实际出发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可取的态度。



《海外新话》

——描写鸦片战争的江戸小说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国和日本地理相近、风俗相似，两国人民互相关心、情长谊深，以至中国发生的事件，往往很快便在日本的文学、史学作品中有所反映，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趣现象。19 世纪 40 年代，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民间小说的热门题材，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840 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个消息通过中国赴日本长崎贸易商人传到日本。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人港的中国商船船主，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报告中国的情况。这种报告称为唐人风说书，又叫清商口单。由于日本人把鸦片称为阿片，因此有关中国鸦片战争的这一类情报，统称为“阿片风说书”。现在从各种史籍上能见到的阿片风说书有十几种，具体报道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由于当时中国赴日贸易船的主要基地

是浙江乍浦,因此对浙江沿海的战事报告尤详。另外,中国商船带去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中国书籍如《夷匪犯境闻见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等书,也是日本人获得鸦片战争信息的一个来源。

当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的作家、学者,立即根据这些素材,编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其反应之快,令人吃惊。下面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

有一部小说叫《海外新话》,共五卷,1849年(日本嘉永二年)出版。作者署名枫江钓人,即岭田枫江的笔名。岭田枫江,名右五郎,字子德,是丹后田边藩藩士,知识渊博,学过汉学、汉诗和兰学。早年就讲求兵法,有志于海防。34岁时,受到中国鸦片战争的震动和刺激,写作了《海外新话》一书。他在该书序诗中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

“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

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

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加强海防,防御外来侵略。据该书

例言所述，作者写作此书主要参考了《夷匪犯境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圣武记》等书。为了适应日本一般武士与庶民读者的口味，采取了当时日本民间流行的军谈读物即描写战争的章回小说的体裁，语言也尽量通俗易懂。

《海外新话》的卷首有《英吉利记略》，介绍英国的史地和现状。其次有《坤舆略图》即世界地图。还有《清国沿海略图》，并用红色标出英军侵犯过的中国府县。此外，还有英将戎装图、英国军舰图、蒸汽船图等。书中附有虎门销烟、定海血战、陈化成战死、南京议和等题材的插图。正文第一卷以“鸦片烟毒附黄爵滋上书事”开始，最后第五卷以“两军和睦事附和约条目”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较详细地描述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经过以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抗战的场面。特别赞扬江南提督、爱国老将陈化成保卫吴淞口是“霜风知劲草”。作者描写陈化成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为国捐躯，“面色犹如生时”。

《海外新话》这部描写中国鸦片战争的作品，由于出版前未送官方审查批准，竟被幕府指

责为“异教妄说”，勒令毁版并列为禁书。作者岭田枫江也遭到迫害，被处以禁锢之刑，入狱二年，出狱后还受到三年之内不准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居住的处罚。甚至连为该书插图的画师也受株连，被捕后死于狱中。但是，由于《海外新话》一书很受读者欢迎，第二年又有卯兵卫、熊五郎等入秘密加以重印出售。

描写鸦片战争的另一部小说名叫《海外新话拾遗》，顾名思义是补充《海外新话》的。也是1849年出版，作者署名种菜翁，不知其真实姓名。此书也是五卷本，与《海外新话》相比，增加了广东90余乡村民愤而起兵（即三元里抗英斗争）、达洪阿台湾抗英等内容，还收录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揭帖。有趣的是书中还将阿片风说书中误传的英王之女被擒之事大加渲染。1840年12月中国商船船主沈耘谷等人提出的风说书中曾经报道浙江沿海的战况，其中提到余姚军民俘获英王三公主的传闻纯属误传，实际上被俘的是英军运输船鸢号船长的夫人诺布尔。传闻中把她夸张成英王的女儿或妹妹了。然而日本作家对这个误传却很感兴趣，在各种小说中大做文章。《海外新话拾遗》的作者写道：英军

中有一位女将勇猛异常，“神变万化，轻如蝴蝶逐花，风吹红叶”。后来在余姚县被俘，发现她原来竟是老英王的三公主，当今英国女王的妹妹。

这个故事还出现在其他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日本小说中。如醉梦痴人写的《海外余话》，也是五卷，1851年刊。1855年又加上插图重版，改名为《海外实录》，由行余堂刊行。书中进一步把那位英国女将夸张为英军总司令。她自称“我乃大西洋英吉利国帝之二女阿岱，这次奉命讨伐广东人所犯罪逆。”情节越编越离奇，书的最后写阿岱与义律都被林则徐生擒，而由道光皇帝特赦回国。结尾还杜撰英国“感恩道光帝，愿永为清国属国，年年进贡，宣扬汉土威风，并祝清帝世代万万岁！”作者居然不顾历史事实，捏造了一个英国最终向中国屈服的结局。这大概是出于日本文人“攘夷”的愿望，并迎合幕府锁国政策和读者的心理吧。所以东野处士在《海外实录》的序中说：“今读是书，最快人意。”

另一种名叫《清暎近世谈》的小说，于1850年出版，早野惠著，亦为五卷。此书从战前黄爵滋上书禁烟始，至战后黄爵滋论国家利害终。这部书则说所谓的英王妹是被守卫吴淞口的老将

陈化成所俘虏，并派兵把她押送到上海城里监禁起来。

这些江户时代末年的日本小说使日本广大的武士和民众广泛了解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并从中得到启发，吸取教训，推动了日本的开国和维新。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战后几年之内写作和出版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鸦片战争的关心重视和反应之快，同时说明鸦片战争给予日本多么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罗森及其《日本日记》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除了少数赴日贸易商船以外,互相往来很少,给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史料的话,仍然可以发现某些先驱者的事迹,例如随美国培理舰队到日本,并写下中国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的广东人罗森,已经用他的活动和著作,谱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最初的篇章。

1853 年 7 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海军准将率领四艘美国军舰组成的远征舰队,驶进了日本德川幕府所在地附近的江户湾(今东京湾),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蒸汽轮船又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他们叫做“黑船”。在美国的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总统的国书,并答应明年给予答复。1854 年 2 月,培理舰队再次开入江户湾,幕

府只得派代表与培理在横滨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从黑船上下来的美方人员中有一位中国人。当时日本画师锹形赤子曾奉命为美方人员画像，其中就有一个圆脸，拖着长辫，戴着瓜皮帽，手持折扇、矮矮胖胖的中国人，旁边写着“清朝人罗森”。另外还有几幅他打伞、摇扇和写字姿态的画像。在当时参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员的笔记、日记和双方会谈记录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罗森的名字和记载。

那么，罗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与培理舰队一起来日本的呢？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县文人。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卫廉士是培理舰队日本之行的翻译官，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他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此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感到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便接受邀请同赴日本。

在拥有七艘军舰一百多门大炮的美国舰队的武力威胁之下，日本幕府被迫接受培理提出的各项要求。1854年3月，双方签订了《日美亲

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美国还可以派领事驻下田。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敲开了。罗森是日本开国的目击者,他曾通过汉文与日方代表、官员笔谈并翻译双方文件(有关条约的文件一般均有汉文本)。

罗森在日本期间还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除官员外还与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崇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日本日记》)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为日本人写了500余幅扇面,而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今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即用嘴衔笔写字),也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恐怕是近代最早

的中日书法交流了。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把自己写的记述太平天国的著作《南京记事》一书借给日本官员平山谦二郎阅读。第一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接近真相的详细介绍。这部著作后来被吉田松阴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1859年3月，罗森在横滨宾馆与日本官员笔谈时，还纠正了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不少误传，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朝皇帝并未逃往朝鲜等等，并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略表同情的倾向。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在他的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一位日本官员向他赠诗：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

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在下田曾经有一位日本人问罗森：你是中国士人，为什么要去当西洋人的翻译呢？罗森便以诗言志，写了一首七律诗回答他，最后四句是：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

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豪情，表达了罗森要走向世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远大志向。在离开日本前夕，罗森与日本友人们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人诗句录扇以作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也吟诗相答，并书于扇面，诗中写道：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
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罗森在访日期间，还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具有很高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日本游记。1854年8月当他随培理舰队回到香港后，就把自己写的这部游记题为《日本日记》，交给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刊登。在1854年11月号、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上分三期连载。《遐迩贯珍》的编者在前面还加上按语，说作者是编者的“平素知己好友”，刊登这篇日记可以增加读者的知识，使大家“耳目为之一新”。

罗森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日本横滨、下田、箱馆（今北海道函馆市）等地

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人民也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他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无有鼠窃狗偷之辈。”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也表示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在横滨，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一次竟能举起二、三包200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叹：“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赞美一位日本少年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聪明俊秀，招人喜欢。

由于罗森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的活动，因此他的《日本日记》也是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料。罗森还记载了《神奈川条约》签订后，培理在美舰上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美方送给日本政府的一批近代化器械，在横滨公开展览，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以惊异赞美的语气对火车、汽艇、电报机、照相机等一一加以描绘。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不少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初次所见，因而倍觉新奇，罗森的描述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罗森的《日本日记》还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并收集了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多首,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在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人到过日本,但其中大部分是官员、商人、水手,偶尔也有少数文人、画师、和尚、医生等,却很少有人留下日本游记。清初以来,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篇》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但汪鹏的活动仅限制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很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东亚历史的转折关头。因此他的《日本日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史学、文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罗森后来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政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赴欧途经香港时,曾在旅馆与罗森会晤,第二天罗森还到柴田乘的船上话别,并送他七本

书。

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中日两国之间交往十分稀少之际,罗森来到日本,并进行了许多友好交流活动,还写下了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这位先驱者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八

千岁丸上海之行

——日本开国后第一艘访华船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862

年(中国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上午,一艘漆着“千岁丸”船名的日本商船,驶进了黄埔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是自从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航行中国二百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也是日本开国以后企图打开中日关系的初次尝试。千岁丸的乘员们还在上海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留下不少记载。因此,千岁丸的上海之行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大事。

日本德川幕府在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与美、英、法、俄、荷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亲善条约和修好通商条约,建立了外交与贸易关系。可是直到60年代,日本与它最邻近的大国中国之间,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通商协定。所以当时日本自幕府官员到各藩的有

识之士，从抵御西方冲击、了解世界形势以及扩大贸易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等角度出发，均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他们还主张应该先对中国的海港和对外贸易情况作一些实地调查。1862年3月中旬，幕府花了34000银元在长崎购买了一艘名叫“阿密斯得号”的英国商船。决定由这艘船担负去上海调查与开展贸易的任务，并把它改名为“千岁丸”。这是一艘载重量为358吨的三桅木造帆船，船上原来的英国船长和14名英国船员仍被雇佣来担任这次航行的航海技术工作。幕府委任了以幕吏根立助七郎与长崎地方官员沼间平六郎为首的八名官员负责与中国交涉与贸易。随行的还有七名中西文翻译、医生和书记员。当时各藩也迫切要求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幕府同意某些藩派出若干名藩士以官吏随员的身份同行。其中有获藩的高杉晋作、萨摩藩的五代才助、佐贺藩的中牟田仓之助等十几人。此外还有三名长崎商人、一名荷兰商人以及仆人、厨师、水手等，全船总人数为67名。千岁丸运载到中国贸易的货物主要有煤炭25万斤、人参5000斤以及海带、海参、干鲍等水产品。

千岁丸于1862年6月7日从长崎出海,6月12日到达吴淞口,13日雇汽船拖曳入黄浦江。千岁丸进上海港时,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英国旗,后桅才是日本旗,船停泊在法租界内荷兰驻沪领事馆附近的江岸。消息传开,码头上聚集了许多中国人围观,他们对日本人的服装和腰佩双刀尤感新奇。而且当时处在太平军进攻下的上海,曾谣传英国邀请日本派兵来中国帮助对付太平军,所以看到佩着双刀的千岁丸日本官员与藩士上岸,就有人产生了误会,悄悄议论“日本兵来了”。千岁丸一行上岸后,便在荷兰领事馆附近的旅馆宏记馆投宿。

到上海的第二天,根立助七郎等日本官员便在荷兰驻上海领事的陪同下,到道台衙门拜访了上海道台吴煦。双方除了礼节性的寒暄外,主要是商谈开展日中贸易的具体措施。日本官员详细地询问了中国当局对目前形势、中日贸易的看法,以及对待外国商人、租界、税收等方面政策。了解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处理外交难题的经验。日本官员还拜访了荷兰、英国、法国等国驻上海的领事,询问开展对华贸易需要了解 and 注意的问题。

除了幕府官员们着重与上海道台及各国领事会谈、应酬外,千岁丸的其他乘员,包括随行的藩士、商人、水手们,都经常自由地在上海城内散步、参观、购货、买书,并随意与中国平民交往、笔谈或互相拜访。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士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接触中国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中国社会情况,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一般上海市民对千岁丸日本乘员的态度颇为友好,到宏记馆来拜访日本客人的中国人士络绎不绝,据记载有学生、武弁、画工、医生、商人、绅士等。藩士们还经常与中国文人通过汉字笔谈交流思想,并探讨宋明理学、世界形势、兵法、文学等各方面问题。如高须藩藩士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话》收录的全是他在上海与中国文人的笔谈。日本藩士们还经常与中国诗人互赠诗篇。另外搜购中国图书也是藩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上海各大小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地方志、地图和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有的书实在买不到,就设法借来抄写,如中牟田仓之助就抄写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天理要论》、《太平诏

书》、《资政新篇》等书。

千岁丸在上海停泊了两个月左右,于1862年8月10日离开上海回国。8月19日回到日本长崎港。千岁丸一行调查收集了有关中国的大量情报和资料,为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政策和开展对华贸易提供了重要情况。锁国以来,日本船和日本人不能来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藩士,大多是日本各藩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青年下级武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以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对于其藩主交给的调查研究任务,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机会,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藩士们还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的成果,其中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研究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最突出的是当

年23岁的获藩士高杉晋作。他是吉田松阴的学生，后来创建了奇兵队，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他在这次上海之行过程中，一个人就写了五种日记与笔记，即《航海目录》、《上海港留目录》、《长崎淹留目录》、《内情探索录》和《外情探索录》，合称为《游清五录》。佐贺藩士中牟田仓之助，明治维新后被封为子爵，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也写了好多种记录，如《从长崎至上海航行日记》、《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唐国上海道台应接书》、《上海渡航日记》等。此外还有佐贺藩士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尾张高须藩士日比野辉宽的《赘疣录》和《没鼻笔记》，肥前大村藩士峰源藏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滨松藩士名仓予何人的《海外目录》、《支那闻见录》、《沪上笔语》等。同行的长崎商人松田屋伴吉也写了《唐国渡海日记》。

从藩士们的日记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国观有个变化的过程。千岁丸刚进上海港时，他们看到江里众多的船只和江岸耸立的高楼，大多赞叹上海的繁荣。可是当他们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就发现与外滩租界内的华丽洋房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旧城中国人居住区的肮脏和混乱，还有鸦片烟毒的泛滥。他们还亲眼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虚弱。尤其是清政府出卖主权勾结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以至西方侵略者在上海横行霸道，连上海城内的孔庙等处都成了英法军队的兵营，使日本藩士们也感到很气愤。高杉晋作等藩士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总结中国的教训，认为只有革新政治军事，才能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铲除暴政并防止农民起义。这种认识成为他们形成倒幕维新思想的因素之一。



黄遵宪与源辉声

——近代中日文人的交往和笔谈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同时也试图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871年9月，中日双方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伊达宗成经过会谈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决定正式建交，互开口岸，通商贸易，并互派外交官，设立使领馆。这就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此，中日人员交往频繁，两国的官员、文人来往不绝，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佳话。

1871年中日建交后，日本不断派遣使节和外交官来华，清政府直到1877年1月才正式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11月27日何如璋率第一届驻日使团乘海安轮从上海出发，30日抵达长崎，长崎烟台鸣礼炮21响并升起龙旗致敬。使团在长崎、神户等地都受到华侨

和日本群众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正式向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不久即选择环境幽静秀美的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作为中国公使馆临时馆址,开展各种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

在第一届中国驻日使团中,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多、影响最大的人物,并非公使何如璋,而是首任参赞官黄遵宪,他不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维新思想家、政治家。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今广东梅县)。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不满封建科举制度,而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到过广州、香港、天津、烟台等商埠,见识较广,眼界开阔。黄遵宪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不顾亲友们的阻拦和惋惜,毅然抛弃了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他是首届驻日使团中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不仅负责与日本外务省及各界人士的联系,而且使团与日本方面的交涉照会及向清政府的报告,也常常由他起草。

作为一个外交官,黄遵宪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日本统治集团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始终据理力争。他在一首诗中指出中日两国: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和杰出的诗人,黄遵宪风尘仆仆漫游日本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人士。他还常常与日本诗人唱和诗篇,通过口说笔谈吟诗题字宣传中日友好,弘扬中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并和许多日本人士结下深厚的友谊,仅仅在他的诗文中提到的日本朋友就有数十人之多。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则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黄遵宪到日本后细致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俗风习,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一百多首“杂事诗”。每首都是七言绝句,内容广泛,短小生动,活泼有趣。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

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他的《日本杂事诗》1877年由清朝总理衙门出版初刊本,收诗154首。以后又有各种版本,至1890年他在伦敦任驻英参赞期间,又把它增订成定本,共200首,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日本杂事诗》上卷主要写日本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等方面,下卷则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如第一首诗生动地概括了日本史地: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

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有一首诗形容日本的名胜富士山也极为形象: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

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另一首描写日本人观赏樱花的景象,也十分动人: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

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除了《日本杂事诗》外,黄遵宪还写了咏颂日本国花的长诗《樱花歌》,记录京都传统风俗的《都踊歌》和歌颂维新志士的《近世爱国志士歌》等许多有关日本的诗歌,收录在《人境庐诗草》之中。黄遵宪通过他的诗歌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

心灵,加深互相理解和友谊,也深深博得中日人民的喜爱,以至“新诗脱口每争传”。

黄遵宪在驻日期间还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他从1879年开始,花了八年多功夫,直至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部巨著。全书共40卷,50万字。分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类。这是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它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又鼓吹学习西方,效法日本,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闪耀着异彩。

在明治初年,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人学者在日本尚享有很高声誉。中国驻日公使馆建立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竞相与中国使团人员笔谈交欢,或以诗酒翰墨共乐。源辉声就是常来的日本人之一。源辉声(公元1848—

1882年),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大河内辉声或源桂阁。他原是日本世袭高崎藩主,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任高崎知事,因不赞成新政而辞官归乡,以后长期闲居东京墨江畔。源辉声精通汉诗、汉学,嗜爱翰墨,广交文士,尤其喜欢与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特别是中国公使馆的官员用汉文笔谈,并以此为乐。他对中国人十分尊重,而且不分长幼贵贱,一视同仁。从公使、参赞一直到仆役、孩子,都与之笔谈。甚至遇到使团会讲日语的翻译,也自称不善言谈,宁肯“以一枝笔换千万语言”。因为笔谈可以留下墨迹作为纪念,所以他每次去中国公使馆都准备好笔谈用纸,一问一答都写在上面,当天晚上就把这些纸裱好,精心保存起来,然后按顺序编排装订成册。这些珍贵的笔谈手稿一直保存至今,统称为《大河内文书》,共计有数百次笔谈,达96卷之多。

《大河内文书》中的这些中日文人的笔谈内容涉及中日两国的政治、学术、文化、风俗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几乎是无所不谈。由于是私下随便交谈,故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并无一点掩饰与做作,颇能反映笔谈者们真实的思想与

生活。源辉声在许多笔谈上还注明了时间、地点、在场人物，有时甚至还记下他们动作、表情，读起来犹如一部演出用的剧本，观笔谈如见其人，声音笑貌，栩栩如生。例如有一次关于文学艺术的笔谈，黄遵宪称赞《红楼梦》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可惜日本人不通汉语，“不能尽得其妙也”。源辉声则介绍日本的《源氏物语》用意相似，你写荣国府、宁国府，我则写宫廷之情，而且作者紫式部是一位才女，此事可能会使曹雪芹吃惊。黄遵宪说遗憾自己不通日语，没有读过《源氏物语》。但看到日本民间几乎人手一册，我想其中“必有妙处”。在笔谈中还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向黄遵宪请教写诗、作文及书法、读书。同时黄遵宪等也经常向日本人士了解日本历史、制度、风俗、典籍，有时还请他们帮助翻译日文资料。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人士的推崇喜爱，因此源辉声请求黄遵宪把一部分诗稿赠他收藏，黄遵宪答应把部分手稿埋在他家的院子里，以为“稿冢”。于是在1880年正式树碑立冢，碑面刻着黄遵宪亲笔书写的“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大字。背面刻有源辉声所撰写的

《葬诗冢碑阴志》记述了自己与黄遵宪的交往、友谊以及葬诗树碑立冢的经过。其中记载石碑刻成之日，源辉声设宴畅饮，黄遵宪亲自把诗稿藏在袋里埋入土中，并洒酒吟诗：

“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

源辉声接着和诗道：

“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诗冢原在东京墨江畔源氏旧宅，后来源辉声去世后，其子迁于其父墓葬地埼玉县平林寺。

中国诗人的手稿，埋葬在日本的国土上，这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多么真挚感人的情谊啊！



王韜的扶桑之游

——中日学者的交流和友谊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中国政府派遣的驻日外交官和访日官员外，还有一些民间文人学者，东渡扶桑，漫游瀛岛，与日本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1879年8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中村楼上，中日文士近百人济济一堂。有人当场酒酣吟诗：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吾始。

敢云提倡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屣。

某年日月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

这位口气豪迈，要在青史留名的“狂生”，不是别人，正是王韬。

王韬，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淞北逸民等，江苏苏州人。1828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塾师之家。他自幼聪颖，怀有匡时济世之志。

17岁中了秀才,但由于家境贫寒,只得到上海以文笔谋生。1849年进入英国传教士所办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并为传教士汉译西书润色。1862年,王韬因被控化名黄畹向太平天国上书而遭到清政府通缉,避难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曾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诗经》、《左传》等书,并应邀访问英国,在牛津大学讲演孔子学说,介绍中国文化,自己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变法自强的思想。1871年,他编撰了《普法战纪》14卷,详述刚刚结束的欧洲普法战争,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最新知识,使其名声大震。《普法战纪》很快传入日本,被翻刻流传,在日本也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学者仰慕王韬之名,纷纷与其通信,并邀请他访日。日本《报知新闻》主笔栗本锄云说:“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于是,他与佐田白茅、龟谷行等人共同发起邀请王韬访问日本。

王韬于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出发,乘舟东渡,途经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最后抵达东京。他在日本历时四个月,计128天,所

到之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日本学者中村正直称颂自王韬来日后，“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

与王韬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员、社会名士，也有诗人墨客和普通百姓；既有学问精深的“东国耆儒”，也有“叩门求见”的少年童子；既有维新志士，也有遗老遗少。尽管他们的地位、身份、经历、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王韬的敬重友好之情，却是共同的，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王韬学问渊博，出口成章，使日本人十分钦佩，“皆愿纳交恐后”，视之为“人中之龙文中虎”，赞其“囊中诗刻三千首，海外名传二十年”。甚至说他“嬉笑怒骂无不成诗”。王韬在其《扶桑游记》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并对许多人加以介绍评论，描绘了明治十三年日本文坛群英的形象。如他称冈千仞“性豪爽高亢”，赞吉田易简“为人磊落奇伟”，颂中村正直“文章倜傥称一时”。

王韬常与日本友人们畅论天下大势，比较

东西文化。针对当时中日两国都有一部分人不顾国情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说:“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今之道矣。”他还指出学习西方文化,要学其根本,而不可徒袭皮毛,“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扶桑游记》)

王韬周游日本各地的名胜古迹,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在神户游千鸟瀑,在大阪观博览会,在京都登华顶山,在东京上野观樱花,墨江看烟火,以及墨田川荡舟、日光山观瀑等等。他还到后乐园怀古,瞻仰朱舜水墨宝,谒拜德川氏家庙,凭吊源赖朝墓冢。

王韬还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及其变化。如叙述东京的孔庙已改成图书馆,“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而隆盛”,而“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他在日本还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已经佚失或罕见的珍本秘籍。如在重野安绎处见

到清初文人孙豹人的《溉堂文集》，感慨“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东也”。

王韬对日本的古典戏剧歌舞伎曾作过细致的观察和传神的描述，称赞“日本优伶，于描情绘景，作悲欢离合状，颇擅厥长”。他还对东西方戏剧艺术特点加以比较，认为“东西洋戏剧，鱼龙曼衍，光彩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

王韬在日本曾给很多日本友人赠诗、题字、作序、改文，在他的访日日记《扶桑游记》中记录了大量唱和诗篇，并记载他如何为本多正訥的《清史逸话》作序，为宫岛诚一郎的《栗香诗钞》改诗，“竭三日之力始毕”。王韬还把带到日本的一批自己的著作如《普法战纪》、《瀛壖杂志》、《弢园尺牋》等书 16 部 78 本送给东京府书籍馆（今东京图书馆的前身）。作为交换，该馆也回赠王韬《大日本史》100 本和大小地球仪两个。其交换文书至今还保留在东京上野图书馆。

1879 年 8 月 21 日，王韬归国前夕，日本友人为其设宴饯行于东京中村楼。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也前来赴宴，中日文人学者出

席者不下百人。王韬当场吟诗留别日本友人，除本篇一开始所引用的豪言壮语外，还写道：“瀛州缥缈神仙居，百日因缘亦足喜。”日本文人学者们也纷纷作诗送别。如狩野良知写道：

“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

意气乘风涛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

中村正直也吟诗道：

“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

充分表达了对王韬依依不舍的真挚感情。王韬于8月23日离开东京，重野安绎、冈千仞等七位日本友人一直送到横滨，“情意殷挚可感也”。8月29日，王韬由长崎乘船回国，临别又向日本友人赠诗：

“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

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

日本友人仰慕王韬的文章学问，要求他写下日记并在日本发表。王韬应允，故每日必记，信笔所至，皆成文章，宛如行云流水，情景交融，亲切自然，并录下许多唱和赠答诗文，构成一部文笔优美的日记体诗文集，即《扶桑游记》，全书近四万言，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报知新闻社出版，当年冬就刊出上卷，次年夏出齐。此书问世

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竞相争读。日本文人皆以名列其中为荣,中国文人也从中了解日本社会和文坛的风貌。

王韬回国后仍不受重用,故曾表示愿再次东游,消息传到日本,“彼都人士皆引领而望矣”。驻日公使何如璋也曾上书清政府要求聘王韬到驻日使馆工作,均未成功。王韬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 1879 年日本之行,确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冈千仞与《观光纪游》

——近代日本人的访华旅行记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9

世纪下半叶，有不少日本文人学者到中国旅行或考察、访问，写下了一些访华旅行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是其中有较高价值的一种。

1884年6月，上海的《申报》上刊登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日本文豪某，携著书千卷，为中土山水之游。”这位“日本文豪”就是王韬的挚友、日本著名学者冈千仞。王韬访日时曾劝他漫游中国，到1884年，冈千仞终于实现了访华宿愿。由于他来华时随身携带了自己的著作《尊攘纪事》、《法兰西志》、《米利坚志》等一大批书籍，准备分赠拜访之中国官员名士，故《申报》上有“携带千卷”之说。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3年。他原是幕末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因主张尊王维新，曾被藩主下狱。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即馆长）等职。后因

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学,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吟咏自娱。其前后有弟子 3000 人,著述达 300 余卷。王韬对冈千仞的品格、胆识和文才十分钦佩,两人志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冈千仞于 1884 年 5 月 29 日从横滨乘船出发,6 月 6 日到上海,会晤老友王韬及其他上海名流。然后畅游苏杭,饱览风景名胜,拜访俞樾等江浙名士,访问朱舜水后裔。在慈溪还受到同船回国的旅日华侨王惕斋家族的盛情款待。他本想前往福州,然而当时正值中法战争马尾之役,只得返回上海,再北上津京,游览长城后经保定返沪。最后又南航广州、香港,因病不得已取消了长江之游计划,于 1885 年 4 月 10 日登英国轮船归国。前后在中国历时 360 日,历程近万里,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 200 名。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有所闻见,必手记。”这些日记总题名为《观光纪游》,其中包括《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等六卷,约六万字。

冈千仞访华期间,广泛进行日中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仅在其《观光纪游》中提到姓名的就有近 200 人之多。

除了好友王韬等人外,还见过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问答应酬,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冈千仞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讳,畅抒其见,甚至有时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各种时弊痛加抨击,表达了希望中国改革和振兴的真诚愿望。

冈千仞游历中国之时,正值中法战争。他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在交谈时,常常劝告中国人士应该适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法,变法自强。他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连名噪一时的学者李慈铭也不太知晓日本的历史,因而为中国感到担忧。冈千仞还利用会见中国官员的机会,竭力敦促中国变法图强。他曾两次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见到他穿着日本民族传统服装和服,以为他是一位“古貌古心”的遗老。冈千仞赶紧解释自己并非崇古而主张知时务,并劝李鸿章“乘是机建大策运大势,转祸为福,变危为安。”他还向李鸿章的部下介绍日本维新历史,并主张从学习

西方文化着手。冈千仞还劝说中国官员实行开放与改革,并向他们介绍欧美各国形势以及日本如何从“锁国一变为开国,致今日中兴之明治”的经验。

《观光纪游》中对中国晚清社会的弊病尤其是鸦片与科举八股的毒害,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向王韬鼓吹“一扫烟毒与六经,振起中土元气”。王韬不仅深表赞成,而且补充说还应加上一个贪毒,即贪污受贿之风。冈千仞还认为中国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实际是一种愚民之术,应该“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冈千仞在访华期间曾应邀到浙江慈谿王惕斋的家乡住了一个月。王氏是当地的豪族富商,对他招待很殷勤,可是他却看不惯他们的铺张浪费和陋规旧俗,当面进行尖锐批评。

冈千仞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一方面赞赏中国的秀丽河山、迷人景色,一方面感叹中国政治腐败、士人不求进取与惨遭外敌蹂躏。他游览北京的圆明园旧址,见其只剩一堆废墟,不由嗟叹不已。他希望“存其迹为励人心鼓义愤之资也”,表达了日本进步人士关注中国命

运,切盼中华振兴的友好情谊与高尚胸怀。

访华期间,冈千仞与许多中国文人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问。他虽然批评科举八股和儒学,但是也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著名学者。例如他特地到苏州拜访著名经学家、诗人俞樾,称颂其“文章著述为一世之泰斗”。他先后得到中国文人学者赠送的书籍 143 种,如获至宝,非常高兴。他还在中国各地搜购中国文化典籍,如在上海买到宋、金、元、明诸史以下 50 余种书籍,立即装成两箱,运回日本。他的愿望是“当世将得金千,重修鹿门精舍,拥万卷”。冈千仞也很重视近代中国人所写的海外游历笔记,他在北京各书店购得近代中国人所著海外游历日记、笔记十几部。他在一个友人家里见到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张德彝写的游历和出使欧洲的记录《四述奇》及《西学考略》等书,爱不释手,借回去阅读。而当时一般的中国文人不太看重这类书籍及其作者,认为这类书“无学问见识”。而冈千仞不同意这种观点,并高度评价《四述奇》等书,认为该书与日本岩仓使团的《欧美回览记》一样,对欧美了如指掌,这两书是“东洋人说欧事之嘴[chāo 蒿]矢”。对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

的不同,他听到中国人嘲笑日本人“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而日本人也讥讽中国的一些旧习。冈千仞则认为不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中日两国“同文邻域而犹异其风俗如此”,况欧美人呢?

冈千仞的《观光纪游》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观察晚清中国社会,痛陈时弊,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这部书帮助日本人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感情交流。



傅 云 龙

——勤奋著述的游历使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9

世纪 80 年代,清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的官员中,有一位勤奋著述的游历使傅云龙,他编写的《游历日本图经》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887 年 6 月,在北京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次不考四书五经,也不写八股文章,而只做边防、史地、外交的策论。原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此事起于 1884 年御史谢祖源向光绪皇帝奏请选派杰士游历外洋。1885 年经总理衙门议覆,由翰林院与六部保荐,各部院共推荐官员 75 名。1887 年,光绪皇帝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选拔考试。6 月 12 日,考吏、户、礼三部官员,题目为“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13 日考兵、刑、工三部官员,题目是“铁道论”与“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考试结果一共录取 28 人,兵部郎

中傅云龙名列第一。这些人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和面试,然后又带领他们拜见皇帝,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出傅云龙、顾厚焜等12名官员为游历使,派遣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使臣长驻日本与美国,但是同时派遣那么多官员去日本和美洲各国游历考察,这还是第一次。

游历使团之中最勤奋、成果最卓著的要数获得选拔考试第一名的兵部郎中傅云龙。傅云龙,字懋元,浙江德清人。早年曾游历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中年在北京任小京官,居“郎署二十年,碌碌无所短长”。他博闻广记,好学不倦,尤其喜欢地理志与兵书,曾参加纂写《顺天府志》。这次能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外国考察,正是他发挥才能的好机会。傅云龙不像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物产等方面资料,以至亲自勘察、询问,绘制各种地图、表格,编为图经。正如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他的,不以游历为一般官差,而“以千秋著书之业,

寓乎其间”。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编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八卷,《游历秘鲁图经》四卷,《游历古巴图经》二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也有15卷。所有图经与余记,总数共达101卷之巨。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共30卷,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国记、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文徵等15类,下面尚有183个子目。大量内容是以图表方式表达,数字具体,统计精细,条理清楚。如天文类包括经纬表、中国日本月朔表、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晴雨寒暑表、沿海气候表、偏多风方向表、潮候表等表。外交类附有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中国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等表。这些图表一目了然,查找方便,简直就是一部对日本进行全面介绍的小百科全书,远远胜过以往中国人所著那些对日本地理风俗等进行模糊笼统描述的著作。其史学价值之高,恐怕仅次于黄遵宪的40卷名著《日本国

志》。而且该书刊印于1889年,还在《日本图志》1895年正式出版之前。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从内容上来说,是包罗万象,力求全面反映日本面貌,并从中吸取借鉴。在写作态度上,他十分注重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他强调对日本的国名、地名,与爵名、官名,“不以古饰今,纪实也”。对日本史实求真求实,至于“妄诞之说”,与其滥收不如不收。对日本的分析评论,“据事直书,公是非于天下也”。傅云龙还特别说明如书中的海岸图都是他“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

傅云龙一行以日本为游历的第一站,自1887年11月14日到日本,至1888年5月29日离开日本。在游历美洲以后,1889年5月27日又到日本,同年10月19日离开日本回国。两次先后在日本停留共约一年左右。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日本与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翹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共三卷,前编二卷和后编一卷,分别是他先后两次访问日本时所写的日记,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在日本游历考察的

具体情况。

从傅云龙自己写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奔波于日本各地,交往日本各界人士,参观日本各机关、工厂、学校,出席各种宴会,游览名胜古迹,唱和诗文,访购逸书。他会见了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黑田清隆等日本政界要人。又参观了三菱造船厂、三菱煤矿、千住制绒所、海军造船所、炮兵工厂、硫酸工厂、纺织厂、铁工厂、酒厂等各种工厂企业。还访问了日本的大学、中学、小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盲哑院、博物院、兵营、寺庙、监狱等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获得很多感性认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曾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仅在爱知县,日本人士求文索诗的不下数百人,以至他一直写到天明,甚至临行时,还靠在车上补写了几张。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夜,日本人士来求字者依然不断。

尽管傅云龙在日本的活动如此繁忙,但是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收集资料撰写《图经》之上。他在第一次访日期间写成日本图经的叙目,

立刻寄回总理衙门。而第二次访日期间,更明确表示“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奋力赶写图经。由于时间紧迫,又在他国异乡,困难重重,使他“心急如焚”。他在《游历日本图经》卷三十的叙例中,曾经谈到编写和刊印中的各种困难。首先是语言文字方面有日本古文、假名、俗体、还有翻译西文等各种不同读音。其次在制图、排版、印刷方面,地图需要铜板镂刻,铁路电线还要用各种颜色显示,校勘也很费时。再加上他是在旅行中写作,在路途的时间往往超过居住时间,“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尽管遇到这么多困难,傅云龙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以至常常写到“墨枯笔秃,力难可支”。旁观者劝其何必自讨苦吃,并预言此书“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他却下定决心“有进无退”。傅云龙以这样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编写、画表、制图、印刷、校对等大量工作,其紧张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在他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四鼓,笔不得体”,“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傅云龙终于以自己废寝忘食的辛勤努力,在四个月里最后定稿编写了这部

30卷的巨著,而且就在日本校对、铅印成书。同时还用铜板精刻了日本总图等44幅最新日本地图。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确是惊人的。当时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并深知其甘苦的驻日公使黎庶昌,在《游历日本图经》的序中曾描写傅云龙著书的辛劳,无论“舟行车息,文酒谈宴”,始终抓紧时间,写作不已。并把他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比,“足迹远过史公,而学又足以经纬所见。”他认为如果以这种精神治天下事,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傅云龙这种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和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而勤奋著述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



三

吴 汝 纶

——赴日考察的教育家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20

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

学、改官制、练新军以至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新政措施,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的经验,因而不少中国官员、学者与各界人士竞相东渡,赴日本取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则是个人自费游历访问。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广泛,从宪政、军事、工业、农业、教育,一直到警察、监狱、卫生等各个方面。尽管他们考察的时间有长有短,收获有大有小,认识有深有浅,然而很多人都写了考察报告或游记,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记录,并对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着重介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

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读书,颇有才华。1865年中进士,为曾国藩之门生、幕僚,后又为李鸿章幕

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教务长）。吴汝纶为了办好学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经验，“一求要领”。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立即开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长崎高级中学医学堂，认真参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解剖标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后几乎天天参观访问，有时甚至一天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学校。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路途劳累，一丝不苟地亲自详细询问学校的章程、教学、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筑、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情况。有时陪同人员劝他休息，他也不肯，并说“我为了国家来到这里，殚精竭虑，正在此时，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即高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华族学校、聋哑学校、士官学校，一直到东京和京都的两所帝国大学。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学校沿革和管理，并收集大量文件、资料和图

表。他还广泛会见日本教育家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其认真、负责、勤奋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在吴汝纶9月29日离日之际，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吴汝纶对日本的各类学校作了生动的介绍，同时联系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分析。如他参观神户幼稚园，看到教师教幼儿唱歌跳舞，做游戏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羡慕，应在中国仿行，可惜缺乏幼儿教师。参观东京富士见小学校时，见到“房屋甚狭隘”，却又听说许多著名人士都毕业于该校，他认为应归功于“教法善也”。访问京都聋哑盲人学校，见到聋哑学生作画、盲人学生作诗相赠时，更是赞叹不已：“此等教育可弥补天地之所憾矣！”在京都帝国大学，吴汝纶参观了校舍后，特地请求校长木下广次博士把京都大学的校舍做一个木制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鉴。在东京帝国大学，他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的介绍，参观了法科、工科和理科，还出席了学生的毕业典礼。他还特地访问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宏文书

院,并为中国留学生赠言勉励。

吴汝纶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教育家和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虚心请教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得到不少启发。如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在东京精养轩饭店宴请吴汝纶,在座的还有八位日本学者。吴汝纶便在席间请每位日本友人“以一言相赠”。于是有人建议中国教育要“打破旧弊”、“扫除锢疾”,有人认为教育要“陶冶品性”,也有人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以国学为中坚”。吴汝纶有时还与日本学者相互笔谈或来往书信,探讨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对于中国如何发展教育,日本各界人士也向他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如有人认为“中国兴学方针应当注意国民教育”,有人建议多派学生出国留学,有人主张多办师范学校,也有人鼓吹“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还有日本人士劝告他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完全照搬日本的教育制度。并提醒他在聘请外国教师时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如明治初年,医学用德国书,而教师为法国人,又以英语讲授,产生很多麻烦,“中国宜改此弊”。这些意见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兴办新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吴汝纶

十分重视，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吴汝纶把这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收获汇编为《东游丛录》一书，在1902年9月考察结束之时就交付东京三省堂刊行。《东游丛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文部听讲，是他亲自到文部省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共18次听讲的记录。日本文部省官员讲介时，由留日学生当场口译，吴汝纶亲自记录。第二卷为摘抄日记，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访问日本期间日记的摘录。第三卷为学校图表，包括东京大学经费开支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课程表等19份图表。第四卷为函扎笔谈，是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会面座谈、笔谈记录和来往信件共28篇。该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新学制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翔实、丰富、具体的资料。连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把日本的学制“集录极佳”，对日本人“亦极有用”。

吴汝纶精心考察日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回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整顿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不料早在他回国之前，守旧势

力已向他发动攻击，流言蜚语四起，竟有某御史向朝廷劾奏吴汝纶，说他东游以来，意气扬扬，在宴会席上必赞同自由之说，接来客常谈民权之主义，彼若久在日本，归来必唱邪说难测，不如急召还云云。慈禧太后还特地为此召荣禄询问。吴汝纶回国后就把《东游丛录》一书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正当他胸怀大志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吴汝纶尚未到京师大学堂述职，先请假回乡探亲，创办家乡桐乡中学，不久即一病不起，于1903年溘然辞世，竟未能实践其访日所得酬其壮志，中日两国人士无不为之惋惜。然而，吴汝纶对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必将永彪史册。



四

留日热潮

——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派

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时期，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热”的盛况：“学子互相约齐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中国人蜂涌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亦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

家、全族留学的情况。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资金,纷纷东渡,络绎不绝。构成了一幅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奇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救亡图存。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其次,清政府提倡和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1898年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在日本大、中学毕业者经过考试,也授以进士、举人出身。”1905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出洋留学成了知识分子重

要出路。清政府还鼓励官费、自费并举,推动了留日热潮的发展。

第三,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形成留日热潮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吸收中国留学生,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与沙俄争夺远东霸权。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特别开设了一批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来,具有地理位置接近、来往交通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等便利条件。

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至1899年各省派赴日本留学

的已有一百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达1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留日热潮达到高峰。以后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制》,对中国留学生制订种种限制和歧视措施,引起留日学生的反感,不少人愤然回国,有的国内学生也因此取消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学过日语才准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还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任教,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日本教育经费削减而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却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此1908—1909年留日学生降到5000多人,1910年只有4000左右。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只剩一千多人。

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

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相当于中学性质)较多,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学到大学毕业的就更少了。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急于求成,归国报效,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也有少数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使他们受到刺激更深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有时穿着中国服装留着长辫的留日学生走在街上,竟有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嘲骂。有的留日学生经过马关订约处或是看到东京靖国神社陈列的甲午战争“战利品”,不禁痛哭流涕,愤

不欲生。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们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因此,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中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爱国热潮。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举行的10多次武装起义,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20世纪初大批留日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还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

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

中国留日学生办刊物始于1900年冬天创刊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1903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等。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脉搏,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到了日本,学了日文,读到不少日文书,急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于是便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

译团体,他们不仅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刊载日本著述的译文,而且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大量著作,及西方著名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日文版的中文译本。留日学生陆世芬等人还创办了教科书译辑社,译编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各省新式学堂采用。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杨度、黄兴等组织了湖南编译社,发行刊物《游学译编》,同时也翻译出版各种日文著作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903年留日学生范迪吉等选译了《普通百科全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100余种。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发行的《闽学会丛书》也是以翻译日文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日文书就有300多种,占当年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引进了大量日语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其中有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如混凝土、俱乐部等。大量是日本人意译

外来语的音读汉字，如出版、原子、哲学、阶级、主义等。还有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如腺、氩等。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引进的词汇至少有 800 多个。

总之，在 20 世纪初，从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先后共计有数万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20 世纪初的留日热潮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



鲁迅与藤野先生

——中日人民的深情厚谊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20

世纪初以来,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接触日本各阶层群众,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与日本人民,尤其是热情关怀和耐心指导他们的日本老师,建立起深厚友谊。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感人的事例。

1931年12月2日,鲁迅给特地来上海向他请教的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赠诗一首: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短短的四句诗,表达了鲁迅对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情景的追忆,也抒发了他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难以忘怀的真挚感情。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即22岁到29岁期间,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七年又四个月之久,可以说他的大部

分青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从东京到仙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鲁迅(公元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他1902年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毕业。作为南洋官费生，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1902年4月到东京，进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弘文学院(后改名宏文学院)学习，编入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入学不久，他就拍了一张身穿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寄给他弟弟周作人。背后的题词非常幽默风趣：“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shāo 勺〕仲弟之英盼。”尽管当时宏文学院条件并不算好，八个学生挤住一间寝室，夏天八人合用一顶日本式大蚊帐。但鲁迅顽强刻苦，毅力惊人，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当然，鲁迅也并非只顾埋头读书，他除了学习之外，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革命活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还曾经到校长嘉纳治五郎

设立的讲道馆练习过柔道。1903年春,鲁迅不顾留学生监督停发公费的威胁,毅然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表示与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决裂。他还秘密加入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并经常与友人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等问题,为浙江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写稿。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决定学医,并要求到离东京较远尚未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仙台是日本东北地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当时只有九万多人口。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情况,过去记载较少。仙台的日本朋友于1973年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经过四年多调查,最后编成了包括170多幅照片图表和470多件文字资料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资料集,再现了当年鲁迅在仙台学习生活的真实风貌。资料反映出鲁迅作为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得到了不少日本老师的亲切教导,同学们的热情关心以及房东和其他仙台市民的帮助照顾。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情谊。藤野严九郎先生(公元1874—1915

年),1874年生于福井县,1896年在爱知医学校毕业,后来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研究解剖学。1901年赴仙台医学专科学校任教,主要担任解剖学课程。1904年,周树人(鲁迅)到仙台医专时藤野刚升为教授,还担任了周树人所在的一年级副级长(即副班主任)。鲁迅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他第一次见到藤野时的印象:“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藤野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他对班上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很关心,“对其对同学之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用功之方法、日语之说法、笔记之写法等”,都经常给予指导,提供便利。藤野先生曾回忆说:“周君身体不太高,圆脸、很聪明的样子,但看来气色有些不太健康,由于语言关系,学习上也有困难。”他看到周树人上课记笔记有些吃力,就在课后检查他的笔记,耐心细致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据鲁迅回忆:解剖学课程开始一月后的一个星

期六，藤野先生派助手叫他去，并要走了他的听课笔记。过两三天后还给了他。鲁迅这样描述了他翻阅送回来的笔记时的感动心情：“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从这以后，藤野先生每周都让周树人送来笔记，进行修改，一直继续到他所担任的课程结束。鲁迅回国以后，把藤野先生改正过的笔记装订成三厚册，精心保存。至今仍收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中。

藤野严九郎教授为什么能在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轻视中国人的情况下这样关怀爱护中国留学生呢？这是与他热爱和尊崇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在藤野先生后来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谈到“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的人们的心情。”

周树人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和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关心爱护，引起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而对中国人持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嫉妒。他们竟造谣说解剖学试题是藤野先生预先

在他的讲义上作了记号,还给他写了匿名信,并要检查他的笔记。对此鲁迅后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使他受到更大刺激的则是二年级的细菌学课上放映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竟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探子,被日军捕获将要处死,而一群中国人却在四周围观的画面。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学生看了还鼓掌欢呼万岁。这给鲁迅极大的震动,原来以为学医可以医治中国人的疾病,现在才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觉醒;即使身体再健壮,也只能成为杀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不仁的看客。所以鲁迅决定放弃学医,而用文艺作武器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改造国民的思想。因此,当1906年春第二学年结束后,鲁迅便毅然从仙台医专退学。

鲁迅离开仙台前,铃木、杉村等同班同学为他开了送别会,并合影留念。藤野严九郎先生也特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并送他一张照片,在背面题上“惜别”两字。鲁迅在东京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三年后,于1909年8月回国。他始终珍藏

着藤野先生的照片,而且把这张照片挂在自己书桌对面的墙上,“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而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孔,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这张照片现在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鲁迅还写了《藤野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文中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和藤野先生自仙台分别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是彼此都没有忘记,都在想念对方。鲁迅晚年向日本朋友写信时,曾多次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可是一直杳无音信。而藤野先生也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后才知道自己学生的消息。在他写的《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中说道:“我对周君的一点帮助,他就那么感动,把我写在书里,称我为恩师,把我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那时我要是知道鲁迅即周树人,是位有名的大文豪,我给他去封信,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遗憾!我因为住在农村,社会上的事一点也不知

道,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了鲁迅逝世消息,深感悲痛。……在此谨对因我的一点点照顾那样感恩不尽的周君之灵,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祝他家属身体健康。”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45年8月去世。

1960年,日本人民为了永远纪念鲁迅这位曾在仙台留学过的中国文豪,在广濑川畔青叶山下风景秀美的地方,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1964年,日本朋友又在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市足羽山山巅上建立了一座藤野先生纪念碑。把藤野先生赠给鲁迅的那张照片头像和“惜别”两字放大后刻在石碑上,碑文“藤野严九郎碑”六字乃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所题。这两座纪念碑,既是记载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的纪念碑,也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里程碑。



宫崎滔天

——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20

世纪初,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得到不少日本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宫崎滔天就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他不仅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中国革命者有着深厚情谊,而且创办《革命评论》,与《民报》密切配合,并肩战斗,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赞颂的佳话。

宫崎寅藏(公元1871—1922年),原名虎藏,因其别号白浪庵滔天,故一般人都称他为宫崎滔天。他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开明豪爽,曾设击剑道场。几位兄长都是自由民权主义者,哥哥民藏鼓吹平均土地,弥藏主张帮助中国革命,都

对他有很大影响。1897年9月,宫崎滔天在横滨见到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和崇高品质十分钦佩,赞叹“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彼之感想又何其诚挚!”1898年,他把孙中山用英文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第一次向日本民众公开介绍中国革命派的活动。同年11月,宫崎还邀请孙中山到他故乡熊本县荒尾村住了10天。1900年,宫崎滔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为之奔走筹措经费和军火,并毅然代替孙中山到广州与李鸿章谈判,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起义失败后,滔天不得不充当流浪说唱艺人维持生活。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着重叙述自己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深受中日两国进步青年的欢迎。孙中山亲自为该书作序,称他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

1905年8月20日,宫崎滔天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并被破例吸收为同盟会会员,他还把自己在东京半多摩郡的住宅提供为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所址，并在门口挂上民报社的招牌。1906年9月，宫崎滔天邀集萱野长知等日本同志，创办日文半月刊《革命评论》，与《民报》相呼应，向日本人民宣传中国革命。《革命评论》从1906年9月创刊到1907年3月停刊，共出了10期。该刊辟有中国革命大势、东亚记事、志士风骨、革命风流等专栏。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讴歌与声援中国革命。他在《中国留学生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已经觉醒，中国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国留日学生“已怀激烈的革命思想，他们的两大主义是建设共和与平均土地，实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他还撰文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革命评论》社与《民报》社之间有着深厚友谊，《革命评论》刊头就是由《民报》主编章太炎亲笔所题。《民报》与《革命评论》还经常互相刊登大幅广告。《革命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民报》的六大主义，并向日本人推荐，“欲知中国之新思想，中国民间之实际乃至革命党人之精神意志，不可不读《民报》也”。从《革命评论》刊登的“编辑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孙中山、黄兴、宋教

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与《革命评论》社同人互相来往拜访、宴请欢聚的热烈情景。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锦辉馆举行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革命评论》社全体成员都到会祝贺。会上黄兴请宫崎滔天讲话,并介绍说:“君赞助我国革命事业,备尝艰难险阻,百折犹不挠其志”。全场欢呼声雷动。滔天也当场慷慨陈词,愿以牺牲生命赞助中国革命。会场气氛极其热烈动人。《民报》和《革命评论》都对这次盛会作了详细报道。

《革命评论》受到中日两国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扬。在“飞雁纷纷”专栏里刊登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来信称,读完该刊“痛快无比”。《民报》、《万朝报》、《新世纪》等中日报刊也来函祝贺。一些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写信或作诗表达其感情。一封来信说拜读贵报“不禁无限热血奋起,三呼万岁”。同盟会员陈家鼎写了《读革命评论有感》诗12首,其中一首写道:

“专制千年是亚东,平权从此唱欧风。
只教点点文章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1907年《革命评论》停刊后,宫崎滔天仍不

遗余力地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亲自签发委任状,委托他“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滔天为同盟会的多次武装起义购买军火,不辞辛苦、贫穷和危险。有一次,日本东京神乐坂警察署的署长设宴招待,企图收买他,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况。宫崎滔天当场义正辞严地给予拒绝。孙中山闻讯,特地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与敬佩,赞誉宫崎滔天是“血性男子,固穷不滥,廉节可风”。信上还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孙中山决定把这件事向中国革命党的同志们广泛宣传,使大家都受到“感激奋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借违反报刊条例为名,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并以不申报发行所地址变更为由,对《民报》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宫崎滔天闻讯,立即为之奔走声援,并请日本律师花井、后藤等出庭辩护,还亲自把有关资料译成日文,供辩护律师参考。同年,留日学生编辑的革命刊物《云南》杂志也遭日本政府勒令停刊。滔天又多方活动,终于帮助《云南》重新复刊。

宫崎滔天不仅与孙中山而且和黄兴、宋教仁等其他中国革命派领导人之间也有着亲密的友谊。1905年,滔天陪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去找黄兴,一起在风乐园餐馆吃饭,促成孙黄的联合和同盟会的筹组。1907年和1910年黄兴两次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之时,都把长子黄一欧寄托在滔天家。滔天待黄一欧就像对自己的亲子侄一样。1908年黄兴父子为躲避高利贷者之逼,也一度匿居东京小石川区宫崎家中。滔天虽然自己生活亦相当困难,仍竭力招待他们。1910年,黄兴自日本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滔天也赶到香港,与黄兴畅谈革命的形势。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宣扬黄兴等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后,滔天在上海遇到黄兴,赞誉黄兴为革命操劳,“晚间三时才睡,清早六时就起床,而不感觉疲劳,真是精力绝伦”。1913年,黄兴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当他得知宫崎滔天生活困难,慨然赠款帮助滔天营造新居,并为之题名“韬园”。1916年黄兴在上海病重,滔天又赶到上海探望,至今滔天故居还保存着黄兴病危时其子黄一欧写给他的短笺:“家严病

危急万分，请宫崎先生偕佐佐木（日本医生）来救命，万急！”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宫崎在上海参加了吊唁活动。1917年4月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滔天又特地从日本赶来送葬。宫崎滔天对黄兴的真挚友情深深打动了当时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和萧植藩（即萧三），他们为此联名写信给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还希望能“一望丰采，聆听宏教”（《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表达对滔天的仰慕之情。

同盟会另一位领导人宋教仁也是宫崎滔天的好友，经常来往。1906年10月，宋教仁患头痛病，住院也不见好转，滔天便主动提出接他到自己家中休养。宋教仁受到滔天一家的殷勤招待、照顾，逐渐恢复健康。养病期间，他们还在一起修订《孙逸仙传》。

位于东京丰岛区西池袋的宫崎滔天故居里，至今还悬挂着孙中山书赠滔天的横幅“推心置腹”，黄兴为滔天夫妇所题横匾“儒侠者流”。在故居中还保存着宫崎滔天与孙中山、黄兴以及其他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大批信件、笔谈、题字手迹与照片等珍贵文物，是研究近代中日关

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真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卷七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1919

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中国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是五四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公元 1889—1927 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自幼勤奋好学，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该校聘请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 10 余位日本教师任教。尽管吉野作造在该校教课只有一年多时间，然而李大钊一直十分珍惜这段师生情谊。据吉野在东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伊藤武雄回忆：1921 年秋，当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访李大钊时，李大钊见面的第

一句话就是：“吉野先生身体健康吗？我是先生在天津教过的学生。”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李大钊曾在自己主编的《言治》月刊上撰文介绍明末遗民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赞扬朱舜水的爱国精神和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帮助，东渡日本留学，次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通过课堂听课和广泛阅读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报刊，尤其是受到吉野作造、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肇等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有很大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15年留日学生集会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会上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1916年5月，他毅然弃学归国，投身国内革命斗争。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政治学系、史学系教授。

吉野作造（公元1878—1933年），日本宫城县人。190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07—1909年应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广泛接触

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1910至1913年又赴欧美留学,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并成为以反对军阀专制、拥护宪政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指导者。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每周评论》。同月,吉野作造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进步团体黎明会。《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并刊登了吉野从东京寄来的希望互相“遥为声援”的信。《每周评论》第7号上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第9号上刊载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12号上又发表了他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创刊,吉野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23号上就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在《忠告黎明会》

一文中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和大多数日本报刊舆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大肆诬蔑咒骂。而吉野作造等日本进步人士,却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正义,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侵略主义的日本不但为贵国青年所反对,也是我们所反对的。“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中所引用,并赞扬吉野的信使“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也是中国人民心坎中要讲的话。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日本《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如在《中央公论》1919年6月号上刊登的《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某些报刊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种种责难。在《新人》6月号上发表的《关于

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中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中央公论》7月号和《东方时论》7月号的文章中,吉野严厉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阐述日中两国人民只有在反对两国官僚军阀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真正亲善的思想。吉野作造的许多观点是和李大钊的思想一致的。在互相声援中也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在五四运动期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吉野作造和李大钊一起倡导和组织了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日教授、学生的互访活动。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首先建议邀请北京的教授一名,学生二三名来日本东京进行恳谈。并把此意写信告诉李大钊,不久就收到李大钊的回信,积极响应吉野的建议并热情邀请他访华。吉野作造认为日中青年交流的计划,不仅是我们少数同志的事,希望今后能成为广大国民的工作。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吉

野作造和东京大学教授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1919 年秋天,吉野的学生,宫崎滔天的儿子、东京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宫崎龙介访问中国,到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时曾与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进步人士会面交流。当时李大钊写给宫崎龙介的两封亲笔信和一封给吉野作造的信,至今还珍藏在宫崎家中。

由吉野作造倡议、李大钊大力支持的北京大学教授、学生对日本的访问,终于在 1920 年 5 月实现。赴日的是北大教授高一涵和学生黄日葵、康白情、方豪、徐彦之、孟寿潜。他们基本上都是李大钊指导和支持的北京大学学生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的积极分子。李大钊还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宫崎龙介。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抵日后,与当时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的许多进步团体、学生组织、著名的学者、作家、记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广泛接触与交流。他们在东京曾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纪念会、东京大学新人会晚餐会、东京大学辩论部和十七日会的演讲会,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的演说会。在京都,与同志

社大学师生举行了恳谈会,还出席了京都民本主义团体六日俱乐部主办的欢迎恳亲会,有京都各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会场上掌声雷动,互相握手,气氛热烈融洽。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在所到之处宣传中国五四运动的真相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官僚的思想,表达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赢得日本进步人士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理解和同情。同时也亲身耳闻目睹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思想的交流和沟通,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北大访日团回国以后,吉野作造即在《中央公论》1920年6月号上发表了《日中学生提携运动》一文,对这次交流活动的意义给予很高评价,指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在精神上有很大隔阂,青年学生之间思想的沟通很有必要,是两国民族真正的亲善。”

五四时期及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尽管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两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努力,1972年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恢复,1978年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